

保田與重郎的「反近代」思想 及其中國觀

曾寶滿*

本文聚焦二十世紀前半日本重要評論家保田與重郎(1910-1981)，考察他的學術背景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著述活動，並探究其「反近代」論述在日本思想史上的位置。本文第一節回顧日本的近代批判思潮，以及保田在相關研究史上的關鍵地位。第二節分析保田如何汲取日本國學傳統中的知識資源，並借鏡德國浪漫主義文學，以建構其反抗「西歐近代」的策略。第三節檢討 1938 年 5 月保田與竹內好(1910-1977)等人在日軍佔領下的北平經驗，以及他們對日本帝國「中日文化親善」政策提出的批判。第四節探討保田自北平返國後，如何展開其獨特的中日戰爭觀。本文強調，昭和初期的「反近代」思想，特徵是強烈重視文化主體性。保田的思想論述一方面繼承日本國學中肯定「弱者」和「物哀」的文藝傳統，以和學傳統的連續性作為制衡「西歐近代性」人文風景的抵抗軸；另一方面，為了抵抗言論自由緊縮，他與國家權力始終保持一定距離，發展出不同於西方脈絡的戰爭美學。

關鍵詞：保田與重郎、反近代、國學(日本)、近代的超克、竹內好

*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昭和初期的「青年」與近代批判

1930 年 11 月，舊制大阪高校發生了因查禁左翼思想而起的罷課事件。由於校方將散佈違規文宣的嫌疑學生交給特別高等警察處置，此舉引來學生們的罷課抗議，甚至集體佔據學生宿舍，準備進行長期抗爭。最終，校方為了防止事態的惡化，對被視為「首謀」的學生——保田與重郎(1910-1981)和竹內好(1910-1977)做出「不論成績，一律畢業」的妥協。¹日後，保田成名較早，其作品在戰中派世代間風靡一時。²竹內則在 1950 年代初連續發表呼籲日本思考近代性與亞洲問題的名文，在言論界取得舉足輕重的地位——兩人成名時間不同，³以及戰爭前後政治氛圍的劇變，讓學者在進入 1990 年代後，才逐漸關注

¹ 大阪高等学校七十週年記念祭事業委員会編，《旧制大阪高等学校史》(大阪：大阪高等学校同窓会，1991)，頁 57-58。

² 指稱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度過青春(約 16-25 歲)的世代。有關「戰中派」一語之淵源，大致以 1950 年代中葉中央公論社舉辦的「戰中派は訴える」座談會為始。小熊英二從社會學角度歸納戰中派的特徵在於，他們和更年長、曾參與到馬克思主義思想流行的前世代相比，失去接觸批判地分析社會的學問之機會，因此大多在感覺上將戰爭視為常態、和平為「異常」，且不諱言訴說對於戰死的憧憬。參見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國——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曜社，2002)，頁 598-610。

³ 竹內好從研究魯迅文學的經驗出發，認為近代中國以文學革命為契機獲得了主體性，產生了不同於歐洲經驗的、內發式近代化的機運。戰後，他將近代日本思想話語中訴求與西方文明分庭抗禮、專屬於亞洲的論則與心情歸納為日本式「亞洲主義」的內涵，並試圖探究在「亞洲主義」下文化主體性的形成。有關竹內好對於「亞洲近代」之主體性的探索，參照岡山麻子，《竹内好の文学精神》(東京：論創社，2002)，以及鶴見俊輔、加々美光行編《無根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を超えて——竹内好を再考する》(東京：日本評論社，2007)。

他們所提出之近代批判論述間的關聯。⁴

日本批判近代化和工業文明的思想系譜，最早可溯源至十九世紀末知識份子對西學衝擊下的「自我」和「他者」之反思。甲午戰爭後日本的國際地位提昇，使知識份子一方面自「立身出世」、「富國強兵」的重擔獲得解放，另一方面則面臨工業化進展所引發的新社會問題，開始思索個人與社會、近代化的意義等形而上課題。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至 1920 年代，在「大正教養主義」⁵邁向成熟的過程中，知識份子開始在德國「文化批判」(Kulturkritiker)的概念之上，展開了日本獨自的探索。⁶1930 年代至二戰期間，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使

⁴ 最先關注到保田和竹內之間的思想關連性的應為日本浪漫派研究者 Kevin M. Doak。Doak 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 GHQ 佔領期，保田和竹內皆試圖在反西歐的亞洲主義基礎上構築戰後日本的民族意識。Doak 並評價，保田所率領的「日本浪漫派」之崛起，對近代日本在文化性自我的創出層面上有著歷史性意義。Kevin M. Doak, *Dreams of Difference: the Japan Romantic School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Kevin M. Doak, *A 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Modern Japan: Placing the People* (Boston & Leiden: Brill, 2007).

⁵ 最先關注大正期「教養派」的唐木順三認為，大正期的「教養」相較於明治的「修養」，喪失了過往藉由武士道、儒教或佛教所培養而成的人格形成(「型」)。筒井清忠則修正唐木的說法，認為明治末期的「教養」繼承了「修養」中陶冶人格的屬性，近代的教養主義也包含了修養主義的性格。渡辺かよ子則總結「大正教養主義」的特徵在於，藉由沉澱與閱讀，以探究具綜合性的真理、傾向於宇宙論式的、非政治性且非實踐性的精英主義。參照唐木順三，《新版 現代史への試み》(東京：筑摩書房，1963)、筒井清忠，《日本型「教養」運命》(東京：岩波書店，1995)以及渡辺かよ子，《近現代日本の教養論——一九三〇年代を中心に》(滋賀：行路社，1997)。

⁶ 如 1901 年高山樗牛(1871-1902)作為綜合雜誌《太陽》的主幹，將尼采作為反抗近代文明、震撼人心的「文明批評家」引介到日本文化界，使「文明批評家」(德：Kulturkritiker)的概念流傳開來。1909 年，東京帝大哲學

得日本批判近代化的論述，逐步滲入對西方文明中心史觀和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國際主義之反動，最終與日本帝國的大陸政策形成政治性共謀(political complicities)。眾所皆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喧騰一時的「近代的超克」論，起源於 1942 年 7 月 23 日至 24 日由雜誌《文學界》、《日本浪漫(無水字邊)派》⁷的同人以及京都學派的學者們所組織的座談會。⁸這場緊隨國策腳步而行的文化界動員，從「西歐近代」沒落的

科畢業的生田長江(1882-1936)開始著手翻譯尼采的超人論，於 1915 年開始翻譯尼采全集的計畫，最終於 1929 年完成。又如文人夏目漱石於 1911 年時的巡迴演講時，批判日本的「文明開化」相較歐洲經驗過於流於膚淺，故帶有「神經衰弱」的性格。參見高山樗牛，〈文明批評家としての文学者——本邦文壇の側面評〉，《太陽》，7：1(東京，1901)，又收入高山林次郎，《樗牛全集》，第 2 卷(東京：博文館，1906)，頁 833-843。高田瑞穗，〈生田長江作品解説〉，收入伊藤整等編，《日本現代文學全集》，第 46 卷(東京：講談社，1967)，頁 410，以及夏目漱石，〈現代日本の開化〉，收入夏目金之助，《社会と自分》(東京：実業之日本社，1913)，亦收入福田恆存編，《反近代的思想》(東京：筑摩書房，1965)。

⁷ 由保田與重郎、龜井勝一郎等人所創刊，自 1935 年 3 月至 1938 年 3 月發行的文藝雜誌。以保田為靈魂人物的「日本浪漫派」文學運動，一方面以「文藝復興」為口號、提倡對日本古典的回歸，另一方面則仿效德國浪漫主義文學中反權威、崇尚自我的創作取向，強調「打破時代的閉塞感」。在戰爭期間，保田的名聲漸漸高於該雜誌，故「日本浪漫派」又成為指稱昭和初期知識份子憧憬日本古典、批判西歐近代性的思想文化運動。有關本文使用的「浪漫主義」，參見註腳 17 之說明。

⁸ 從日本思想史而言，「超克」一語，源自於大正期的評論家生田長江對尼采思想的引介。「近代的超克」的概念，則源於 1942 年文藝雜誌《文學界》召開的同題名之座談會，以及綜合雜誌《中央公論》所召集的「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座談會。前者由京都學派的學者、雜誌《日本浪漫派》和《文學界》的同人所組成，後者由京都大學的高坂正顯、鈴木成高、西谷啓治、高山岩男所組織。「近代的超克」座談會共有 13 位知識份子(西谷啓治、諸井三郎、鈴木成高、菊池正士、下村寅太郎、吉滿義彦、小林秀雄、龜井勝一郎、林房雄、三好達治、津村秀夫、中村光夫、河上徹太

歷史認識出發，議題本身帶有粉飾開戰目的之政治性。故而，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的盟軍佔領期(1945-1952)，當新憲法帶來了民主化與自由主義的洗禮，「近代的超克論」成了竹內好所言，30 歲以上知識份子的緊箍咒——對有些人而言，勾起的是懷舊情緒，但對大多知識份子而言，更多的則是怨恨。可以說，自明治晚期以來日本知識份子圍繞近代化而生的諸般作為，使得「文明批判」此一移植西歐的概念，疊加了日本獨特的精神和社會經驗。

「近代的超克論」在敗戰當下變得「惡名昭彰」，使許多知識份子紛紛對近代批判的思想論述進行了猛烈批判——這種試圖清算戰前思想、將之蓋棺論定的知識氛圍，在日本進入冷戰下的「逆進程」⁹時代，為竹內好與戰中派世代橋川文三(1922-1983)所打破。1951 年，竹內好呼籲人們省視戰爭期間「思想上的日本浪漫派」，特別是其作為近代主義的反命題而被提出的時代意義。¹⁰橋川文三則以戰爭期間的親身經歷出

郎)參與其中，目的在於「以「近代的超克」為題，從各方面檢討現代文化的本質。」參見河上徹太郎，〈後記〉，《文學界》，9：9(東京，1942)。該座談會於隔(1943)年出版同題名論文集，參見知的協力會議編，《近代の超克》(東京：創元社，1943)。

⁹ 指稱在 1940 年代末 1950 年代初，駐日盟軍隨著冷戰的激化而改變佔領政策，以復興日本經濟為主要目標，釋放戰中握有權力的政壇、實業界人物，並逐步建立自衛隊，否定戰後民主主義潮流的傾向。「逆進程(逆コース)」最早出現於 1951 年 11 月 2 日至 12 月的《讀賣新聞》，此後成為一規範化用語。參見福井英雄，〈「逆コース」と戰後体制の形成〉，收入日本政治学会編，《戰後国家の形成と經濟發展——占領以後》(東京：岩波書店，1991)，頁 211-230。

¹⁰ 參照竹內好，〈近代主義と民族の問題〉，《文學》，19：9(東京，1951)，頁 39-43。又，竹內對於保田不參與「近代的超克」座談會一事，有以下推測：「我不知道保田不參加的直接理由，然而，從當時保田的思想而言，我認為他並不認同這種活動的意義。」參見竹內好，〈近代の超克〉，收入伊藤整編，《近代日本思想史講座》，第 7 卷(東京：筑摩書房，1959)，

發，剖析「思想上的日本浪漫派」之出現恰好為 1930 年代前半葉，在馬克思主義文學運動退潮後遭受「不安、頹廢、轉向和喪失感」席捲的知識青年層提供精神上的堡壘。¹¹在上述竹內好與橋川文三的論述中，「思想上的日本浪漫派」指稱的並非狹義的雜誌《日本浪漫派》的文學同人，而是廣義地稱此文學運動的代表人物保田與重郎的思想論述，以及其所象徵的昭和初期(1926-1941)青年世代共有的一種問題意識。

有關昭和初期的精神樣貌，既有的研究成果已粲然可觀。根據清家基良的考察，以滿州事變為序幕，在 1930 年代日本言論界風行的各種國族主義論述間，存在一種「共通感覺」，即是「與盎格魯薩克遜的對決」。這是何以「思想上的日本浪漫派」受到知識青年們青睞的緣故。¹²另一方面，從心理分析的手法剖析昭和初期軍國主義與精神史的竹山護夫(1943-1987)，則將保田的存在置於昭和初期「文化動搖」的脈絡。竹山指出昭和初期的思想界為一種「邊境版《西方的沒落》」——當傳統價值面臨危機的當下，「日本浪漫派」道出了對文化主體性感到徬徨的青年們的心聲，是青年世代情懷的「語言化」。¹³關於此點，大貫惠美子指出，在二戰期間，大量閱讀是日本知識青年們表達內心思想的一種方式，官方的意識形態和激進的國族主義者常為重製傳統而有目的地挪用「思想上的日本浪漫派」的觀點，而接收端的青年們也可能「誤識」這些觀點。¹⁴

亦收入竹內好，《日本とアジア》(東京：筑摩書房，1993)頁 172。

11 橋川文三，《增補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説》(東京：未來社，1965[初版為 1960])，頁 15、26-27。

12 清家基良，《戰前昭和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諸問題》，(東京：錦正社，1995)，頁 372。

13 竹山護夫，《近代日本の文化とファシズム》，(東京：名著刊行会，2009)，頁 123。

14 大貫惠美子從人類學的角度使用「誤識」(或作「誤認」)一語指稱社會行動者未意識到自身從同一個象徵符號(如櫻花、《日本浪漫派》的思想話語)讀出不同解讀，而若將象徵交流作為一文化現象，美學化造成的「誤

綜上所述，昭和初期日本的近代批判之思想論述，受到國際局勢和國內思想文化環境變化的影響，同時產生試圖「超克」近代以及追求文化主體性等思潮。保田與重郎作為戰爭期間代表性的言論領袖，對於戰中派世代有很大的影響力。然而，由於戰後政治和思想上的立場問題，關於保田的正式研究遲至 1990 年代後才得以展開，至今仍有許多尚未究明的課題。本文的重心，在於考察保田的教養、學術背景以及他訪問中國的經歷，對他的「反近代」論述和中國觀產生何種影響。具體而言，本文特別選定保田的「反近代」論述和中國觀作為考察對象，出於以下考量。

首先，在橋川文三、伊豆利彥和石川公彌子的研究中已指出，保田常常為了對抗「西歐近代」，在措辭上帶有強烈的「反諷」(irony)特質。¹⁵這種「反諷」揉合了和學傳統中的修辭手法和倫理觀，¹⁶以及德

識」是一普遍現象。參照大貫惠美子，《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頁 28-30、45。

¹⁵ 關於保田的反諷表現，橋川文三、伊豆利彥和石川公彌子皆提出重要的觀察。橋川指出，保田的反諷精神是對於一切的政治性現實主義的排斥，其反諷表現之底流，是「對於敗北的必然之預感」。石川則闡述保田的「反諷」表現是有意識地融合了日本國學者富士谷御杖(1768-1823)的「倒語論」以及德國浪漫主義文學中以「反諷」質疑啟蒙主義之作法。有關「倒語」的言語脈絡，富士谷御杖的〈歌道拳要〉以《日本書紀》的「諷歌倒語，掃蕩妖氣，倒語之用，始起乎茲」之文句，為上古「倒語」的濫觴，認為「倒語」的本質在於，「不直言所思之情，而於意想之外的花鳥風月中綴詞」(「思ふ情をば直にいわずして、思はぬ花鳥風月のえへに詞をつけられたる」)，講究「倒語」的言者與聽者之間的默契。參見橋川文三，《增補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說》，頁 42-43，石川公彌子，《〈弱さ〉と〈抵抗〉の近代国学——戦時下の柳田國男、保田與重郎、折口信夫》(東京：講談社，2009)，119-120 頁，以及富士谷御杖著，三宅清編，《新編富士谷御杖全集》，第 4 卷(京都：思文閣，1986)，頁 766-767。

¹⁶ 「和學」相對於漢學，泛稱以日本為對象的諸般學問，即日本古典研究。

國浪漫主義中對於「啟蒙」的質疑精神。¹⁷其次，保田曾於 1938 年 5 月前往朝鮮半島、中國進行四十餘天的旅行，在北平停留之際，由竹內好居中牽線促成了與中國文人的聚會。關於保田思想論述變化的關鍵，學者們以保田的北平之旅為中心，提出了極為不同的見解。日本文學者伊豆利彥指出，保田著述立場變化的「飛躍性契機」在於 1938 年中國旅行時的見聞，自此以後，保田的文章中「向下的、消極的」成分激烈轉變為「樂天的、向上的、積極的」。¹⁸比較文化研究者佐野正人則比較保田在接觸朝鮮文人和中國文人後所留下的記述，指出保田在北平之旅所遭遇的內在性挫折，使他的亞洲風景論中排除了中國的存在，形成「日本——朝鮮——蒙疆」的跨民族構想。¹⁹另一方面，近代中日文學史研究者王升遠則認為，保田訪問北平當下的失望乃因他希望留平文人更鮮明地展現對日立場，而保田數年後回顧訪平經歷時的「回首自得」，則來自於他「迎合日本軍部對華戰略的邀功請賞」以及「順應潮流、相機而動的投機行徑」。²⁰針對上述先行研究，本文認同伊豆氏和佐野氏所論，即保田訪問北平的閱歷以及他對中日戰爭

在漢文脈中亦被稱「倭學」。該語彙最早可溯源至江戶時代初期儒者林鶯峰的著作《忍岡家塾規式》(1666)中的「倭學科」。

¹⁷ 本文中所使用的「德國浪漫主義」、「浪漫主義」或「德國浪漫派」等語，乃指稱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上半葉的德國浪漫主義 (German Romanticism) 思潮，即德國知識份子在哲學、文學書寫、藝術創作及美學理論上發起訴求反理性、反權威，以及崇尚自我的思想文化運動。

¹⁸ 伊豆利彥，〈日本浪漫派と戦争・序章——保田與重郎を中心に〉，《国文学——解釈と鑑賞》，44：1(東京，1979)，頁 69-77

¹⁹ 佐野正人，〈日中戦争期の言説としての保田與重郎『蒙疆』〉，收入吳京煥、劉建輝編著，《日本浪漫派とアジア——保田與重郎を中心に》(京都：晁洋書房，2019)，頁 124-125。

²⁰ 王升遠，《文化殖民與都市空間——侵華戰爭時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體驗」》(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頁 249-250。

的觀點，是牽引他論述產生變化的一大關鍵。但關於王升遠評論保田訪平後的言論活動呈現「迎合日本軍部」、「順應潮流」的部分，則仍有商榷空間。以下，本文將以保田和當時留學中國的竹內好等人的往來書信，以及他在戰爭期間的著述活動為線索，²¹考察保田和北平的知中派日本人之間的思想聯繫，以及彼此面對帝國侵略戰爭的立場與態度，重新檢討保田的「反近代」思想及其中國觀。

二、保田與重郎的「反近代」思想之形成

保田於 1910 年出生在奈良縣櫻井市三輪山附近，祖上自古以來為經營林業的豪商之家。三輪山是日本古典「紀記神話」中大和政權的發源地，也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保田自幼沉耽於閱讀《萬葉集》、《古事記》、《古語拾遺》、《延喜式祝詞》以及王朝時期的和歌、物語等書物，奠定其深厚的日本國學素養。1928 年，保田離開奈良，進入舊制大阪高校乙類(德語科)就讀，1931 年入學東京帝國大學美術史學科。這段期間，是形塑「評論家保田與重郎」的關鍵時期。在自敘回憶的文章〈一個文學的時代〉中，保田談到少時選擇德語科的原因，是對「彷彿文明代表者」的美國不具好感，且同情於一戰中戰敗的德國。保田進入東京帝大後選擇專攻美術史學，則是因美學「就現狀而言，是最不像學問的學問，而且也是沒有採用文明開化風的洋

²¹ 本文所使用的保田相關材料，主要為第一出版センター編，《保田與重郎全集》，第 45 冊(東京：講談社，1985-1989)，熊木哲、杉浦靜、須田喜代次、松木博整理，〈肥下恒夫宛保田與重郎書簡〉[復刻]，《大妻女子大學紀要・文系》，26(東京，1994)，頁 183-200，以及相模女子大學圖書館所藏同人雜誌《イロニア》中所收保田與重郎書簡(收信人：柏原典子、中谷孝雄夫婦)之復刻。當中，《イロニア》為同人內部流通之刊物，印刷量不高。依筆者所見，目前尚無運用保田書簡進行分析之研究。

學之形式的學問。」²²這種與「文明開化」徹底對決的姿態，成為保田早期評論的一大特徵。

在東京帝大就讀期間，保田集合高校時期以來熟識的文學同人，創立雜誌《コギト》——取自笛卡兒「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コギト》的收稿與編輯主要由保田擔任，保田時常聽取大阪高校時期的友人如肥下恒夫、竹內好的意見，調整編輯方向。²³該雜誌於1933年7月發展為向全國流布、徵稿的雜誌。1935年，在《コギト》的成功之上，保田又邀請神保光太郎(1905-1990)、龜井勝一郎(1907-1966)、中谷孝雄(1901-1995)等人創立了雜誌《日本浪漫派》，寫下創刊詞：「我們熱愛古典人，我們自身也常自擬為古典人而感到澎湃。」²⁴將確立古典系譜視為《日本浪漫派》的任務。

保田成熟早慧的寫作能力很快便於文化界中獲得認可。在讀大阪高校期間，保田在《思想》上刊登〈關於「好去好來之歌」中言靈之考察——古代國家成立的輪廓〉一文。自1935年始，保田以《日本浪漫派》的創刊為起點，展開活躍的著述活動。1936年11月出版第一本評論集《日本之橋》，隔年獲得第一回池谷信三郎大賞，受到佐藤春夫(1892-1964)等文壇前輩賞識。加入長谷川如是閑(1875-1969)和佐藤春夫等文人聯名的「新日本文化之會」。²⁵1938年，保田和佐藤春夫一

²² 保田與重郎，〈一つの文学時代〉，《日本浪漫派の時代》(京都：新学社，1999)，頁67-68。最初收錄於《日本浪漫派の時代》(東京：至文堂，1969)。

²³ 竹內好曾出現於《コギト》雜誌最初的廣告上，但並未在該誌發表過文章。有關保田諮詢竹內意見之事，參照熊木哲等編，〈肥下恒夫宛保田与重郎書簡〉1932(昭和7)年3月27日[復刻]，頁185。

²⁴ 保田與重郎，〈日本浪漫派のために〉，《三田文学》，10:2(東京，1935)，收入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全集卷》，第2卷(東京：講談社，1985)，頁450。

²⁵ 1937年7月17日，在新官僚松本學和作家佐藤春夫的提案下，「新日本

同前往朝鮮半島與中國旅行，返國後以評論集《戴冠詩人的第一人者》獲北村透谷大賞，以 28 歲之齡，確立了作為文藝評論家的地位。

有關保田在戰前言論界受到擁戴之緣由，可整理為以下兩項特徵。首先，是保田在肯定青年世代的「脆弱」之上，訴求對「自我」的伸張。保田在高校時期曾因參與校內的「社會科學研究會」、私讀《無產者政治教程》一事而被校方處分。²⁶進入帝大後，保田並未追隨當時已發展至鼎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及其論爭，²⁷而是投入美學、倫理學以及德國浪漫主義文學的世界。

保田對德國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傾心，特別反映在他的初期著述。1933 年，他的大學畢業論文以德國浪漫派詩人腓特烈·賀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為題，論述賀德林對於古希臘城邦國家悲劇的理解，以及他對古希臘民主的讚揚。²⁸1934 年，他撰文探討德國早期浪漫派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施勒格爾(Friedrich Schlegel, 1772-1829)的小說《盧琴德》(Lucinde,

文化之會」成立，該會由當時首屈一指的文人柳田國男、長谷川如是閑和佐藤春夫等作為發起人。參見伊藤隆編，《松本學日記》(東京：山川出版社，1995)，1937 年 6 月 7 日、同月 14 日之記述。又，當時擔任「新日本文化之會」的機關誌《新日本》之運作的成員，包含林房雄、保田與重郎、荻原朔太郎、芳賀檀、中河与一等文人，會務幾乎由《日本浪漫派》的同人所包辦。參見淺野晃述、檜山三郎，《隨聞・日本浪漫派》(長野：鳥影社，1987)，頁 21-22、216。

²⁶ 大阪高等学校七十週年記念祭事業委員會編，《旧制大阪高等学校校史》，頁 57。

²⁷ 如 1930 至 1934 年間，從講座派的巨人野呂榮太郎(1900-1934)的《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1930)，到服部之聰(1901-1956)、羽仁五郎(1901-1983)等人所執筆的《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岩波書店，1932-1933)，形成了著名的日本資本主義論爭。

²⁸ 保田與重郎向東京帝國大學提出的畢業論文題名為〈清らかな詩人——ヘルデルリンの覚え書〉(1933)，後收錄於其評論集，保田與重郎，《英雄と詩人》(東京：人文書院，1936)。

1799)，分析施勒格爾在情感的自白(self-expression)描寫上所呈現出的個體反抗意識。²⁹無論是賀德林的古典論中對古希臘和德語世界之連結，還是施勒格爾作品中對「自我」的深度剖析，都對後來保田的著述立場和表現策略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保田在言論界嶄露頭角之際，恰好為馬克思主義文學運動退潮的時期。他在 1930 年代中葉和戰爭時期的評論中，都對「青年」有著明確的界定與訴求：

從世代而言，我們這些青年約是在 1920 年代末到 1930 年代初度過我們的青春。在過去的日本，從來沒有一個時代的青春經歷過如此激烈的時代。也沒有任何時代比今日的我們，更加受到人類良心的種種刺激。在這狂亂的時代，在這最容易受傷的年齡，我們要展開為最容易悲痛的時代之心情下所生存的人們而做的文學。³⁰

昭和初年風靡了新聞業、將天下間的青少年盡收於傘下的此[社會主義文藝]運動，約在昭和七、八年，當青年的生活遭遇了最壞的失業狀態之際，這個立足於青年的人文主義的運動，轉向了極端的頹敗和絕望。這種絕望使人失去了和權力進行正面撞擊之方法。青年的絕望心情，從彼時開始一直持續至現今。³¹

²⁹ 保田與重郎，〈ルツインデの反抗と僕のなかの群衆〉，《コギト》，30(東京，1934)，又收入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全集》，第 3 卷，頁 171-194。

³⁰ 保田與重郎，〈後退する意識過剰——「日本浪漫派」について〉，《コギト》，32(東京，1935)，又收入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全集》，第 2 卷，頁 419。引文為筆者自行翻譯。

³¹ 保田與重郎，〈我国に於ける浪漫主義の概観〉，刊登於《現代文章講座

保田所定義的「青春」，是在治安維持法與特別高等警察對馬克思主義思想展開鎮壓的 1920 年代末到 1930 年代初。日本雖於 1931 年發動滿洲事變，1933 年退出國際聯盟，但在 1935 年，日本和美國、中國的和平交涉仍在同步進行中，滿洲事變時期日本國民的「戰爭熱」也僅為一時性。³²對於當時一般的年輕人而言，戰爭還非切身感知之物。保田精神喊話的背景，更多是基於日本在 1934 年普羅文學作家同盟解散後，思想文化界的徬徨。保田筆下所流露，對於青年們面對政經環境壓迫下的無力與絕望之同理心，以及肯定個體「脆弱」的價值觀，對同世代的知識青年、特別是由左至右「轉向」後的知識青年具有一定吸引力。

相較於《日本浪漫派》的刊行只維持了三年左右，³³保田自 1940 年到 1945 年間在各大綜合雜誌上刊載了 600 篇以上的文章。中日戰爭期間，「評論家保田與重郎」的名聲已超越了他自己所率領發行的同人刊物。戰後著名的評論家吉本隆明(1924-2012)、村上一郎(1920-1975)以及政治思想史家橋川文三，皆曾吐露過戰爭期間熱心閱讀保田作品的少年回憶。³⁴橋川於《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說》(1960)中剖析道，在戰

第六卷》(東京：三笠書房，1940)，原題為〈浪漫主義と自然主義〉，收於《保田與重郎全集》，第 11 卷，頁 299、303。引文為筆者自行翻譯。

³² 有關滿洲事變期地方社會的「戰爭熱」的消退與選舉之關係，參見有馬學，〈田所輝明と滿洲事変期の社会大衆党——1930 年代における「運動」と「統合」(一)〉，《史淵》，125(福岡，1988)，頁 83-108，以及有馬學，〈日中戦争と社会大衆党——1930 年代における「運動」と「統合」(二)〉，《史淵》，129(福岡，1992)，頁 65-85。

³³ 《日本浪漫派》於 1935 年 3 月創刊，1938 年 8 月停刊。

³⁴ 有關戰中派對自身戰爭期間的保田與重郎體驗之追憶，參見小川徹，〈戰中派の保田与重郎体験〉，《現代の眼》，16：12(東京，1975)，頁 184-191，以及平野敬和，〈ロマン派体験の思想史〉，《甲南女子大学研究紀要・文学・文化編》，42(神戸，2006)，頁 167-175。

爭期間，越是厭惡右翼和法西斯主義觀念的青年，越是容易傾倒於保田的作品。³⁵

保田所率領的「日本浪漫派」文學運動，汲取了德國浪漫主義初期發展中，訴求從既成體制中獲得個人解放之原理，³⁶將昭和初期知識青年們的情懷編織成文字。保田的昭和浪漫主義，是讓被國家體制壓抑的青年們與國家對立的一種方法，也是確保某種思想基礎的一種文化運動。戰爭期間負責出版品思想檢閱的內閣情報部文藝課長井上司朗(1903-1991)曾追憶，「在戰前和戰中，保田與重郎對我們這些服侍於文化管制的人而言，是最難以處理的一號人物。」³⁷事實上，自 1944 年開始至敗戰為止，保田的行蹤便受到日本便服憲兵的監視，更在 1945 年 3 月於病中被徵召入伍，最終在中國河北石門的陸軍醫院迎來日本的戰敗。³⁸

³⁵ 橋川文三，《增補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說》，頁 19。

³⁶ 以 1935 年保田剛入文壇時的語言來說——「我們的時代是反諷的時代。在今日，我們不得不思考將所有偉大的、光榮的事物作為自我的原鄉之反諷。」參見保田與重郎，〈文学の曖昧さ〉，《日本浪漫派》，（東京，1935），也收入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全集》，第 3 卷，頁 62。

³⁷ 井上司朗（筆名：逗子八郎），〈ますらをにして詩人、そして預言者——保田與重郎の思い出〉，收入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全集》，第 30 卷〔月報〕，頁 2。

³⁸ 評論家大岡信回首自己的少年時期，在戰爭剛結束之際，他就讀於靜岡県立沼津中學校，當時的中學老師仍拿著《コギト》的刊物讓學生流傳閱讀。同時期，傾慕保田的柘木喜一、奧西保、玉井一郎、高島賢司等人也聚集於奈良櫻井，組成「まさき会祖国会」（1949）。奧西等人於 1957 年在京都成立出版社新學社，每年舉辦紀念保田的炫火忌，1980 年代推動保田的全集之出版，並自 1999 年起出版保田的文庫本（32 冊）。可以說，「思想上的日本浪漫派」其思想史定位雖尚未究明，但其情懷至今仍透過許多形式在日本民間流傳。參見大井浩一，〈大岡信と戦後日本 / 2 父と教師たち 特異な思想環境が下地に〉，《毎日新聞》，2018 年 5 月 2 日（夕刊），

保田著述的第二特徵，是以日本國學的倫理觀和自然觀作為抵抗軸，反抗「西歐近代性」的人文景致。一般而言，在前近代日本的諸學問體系中，相較於儒教和佛教對「人欲」和「情」進行辨別善惡的道德性價值判斷，和學中關於和歌與物語的思想主張「人情」的解放，其倫理觀則關照自我內心世界的純粹性。³⁹保田筆下所描繪的和學傳統的主旋律，是自古代的《萬葉集》、中世的「侘寂」之美到近世的「物哀」思想中，直率言情、肯定「哀」和「弱」的美意識。⁴⁰

在保田的成名作〈日本的橋〉⁴¹中，他以散文形式暢談「橋」的比較文化論，信手拈來和歌、傳說和東西史話，從中帶出日本有別於西方的文化特徵。在比較日本的古橋與羅馬的石造橋時，他說，以今日的文明觀來看，羅馬的石橋和水道橋宏偉壯觀，而日本的木橋「貧弱」而「無所依靠」，似乎要使日本人汗顏；但正是這份「哀憐」使得這些形單影

網路版，以及奧西保等，〈著作年表／年譜〉，收入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全集》，別卷5，頁155、167。

³⁹ 日本倫理思想史上的「誠實」概念，意味著除去虛偽、正直且熱心地對應事物和人本身，而非面對團體或他者。從賀茂真淵到本居宣長，都肯定了儒教的善惡價值判斷中被否定的「人欲」和「情」。相較於「漢土」的「理」損毀人的自然性，和學的「人情」則是藉由歌（「まこと（真言）」）展現人心（「まごころ（真心）」）。有關「誠實」概念的傳統，參照相良亨，《誠実と日本人》增補版（東京：ぺりかん社，1998），以及清水正之，《国学の他者像——誠実と虚偽》（東京：ぺりかん社，2005）。

⁴⁰ 相較於西洋的美學（aesthetics）是從諸多藝術分野中網羅出的抽象概念，具有純粹的概念性特質，日本的美意識如「哀（あはれ）」、「幽玄（ゆうげん）」和「侘寂（わびさび）」等語，帶有倫理性、宗教性乃至存在論上的意義，無法自西洋的美學中找到完全貼切的對應概念。故本文中以美意識總稱之。有關日本傳統的美意識的歷史脈絡，參照田中久文，《日本美を哲学する——あはれ・幽玄・さび・いき》（東京：青土社，2013）。

⁴¹ 〈日本的橋〉初出於《文學界》1936年10月號，收於1936年11月出版的評論集，保田與重郎，《日本的橋》（東京：芝書店，1936）。

隻的木橋顯得可憐可愛、融於自然，描繪這些木橋的浮世繪，其神韻更感動了十九世紀的西洋畫家。保田的筆致由柔轉剛，批判那些僅僅由於西洋人的肯定而在日本藝術中獨尊浮世繪的文務省日本文化宣傳員和外務省觀光局員，認為他們「鄙俗地犧牲真正的日本」，「從不為了今日的日本試圖克服日本的前世紀」。⁴²而關東大震災以後的復興帝都計畫，擬在東京建立一系列現代化橋墩，在保田眼中不啻是「近代文明橋樑的範本博覽會」，「復興建築總是無法考慮到和周圍風景的調和，以及四周的美觀。」大多數的都會人都未察覺這樣的無奈，反而沾沾自喜於東京建築的近代文明化。⁴³上述立基於日本美學，對西方工業文明所做的批判，輔以保田獨特的造詞與文風，使〈日本的橋〉發表在《文學界》後，獲得文藝界壓倒性的好評。1930年代長期擔任《文學界》的責任編輯，本身也是評論家的小林秀雄(1902-1983)認為，在缺乏優秀評論家的文化界中，保田「在創作的同時，完整地掌握到若非透過評論的形式便無法表現出來的自我。」⁴⁴坂口安吾(1906-1955)則評價道「在訴說自我之際，若能掌握著如此的表現力的話，也無採取小說形式的必要性。將這篇文章納入創作的範疇也不為過。」⁴⁵

小林秀雄和坂口安吾對保田評論的高度評價，與昭和初期「日本事物」⁴⁶的流行有極大關係。在1930年代中葉，當日本面臨國際地位

42 保田與重郎，〈日本的橋〉，收入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全集》，第4卷，18-19頁。

43 保田與重郎，〈日本的橋〉，29頁。

44 小林秀雄，〈新人への批評賞〉，《東京朝日新聞》，1936年9月23日(朝刊)，第6張第1頁。

45 坂口安吾，〈文藝時評欄〉，《都新聞》，1936年9月28日(朝刊)，第3張第2頁。

46 根據河田和子的考察，戰前有關「日本」的討論最早見於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之間，而「日本事物」(日本のなもの)一語，則自1935年前後開始被

的變化以及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退潮，知識份子開始在美學、倫理學和社會科學等諸領域產生了探究文化主體性的學術風潮。在保田創刊《日本浪漫派》之前，已經有了谷崎潤一郎(1886-1965)的《陰翳禮讚》(《經濟往來》1933年12月至1934年1月號)、九鬼周造(1888-1941)的《「粹」的構造》(1935年，岩波書店)、和辻哲郎(1889-1960)的《風土》(1935年，岩波書店)等，論述日本美學與心性的著作。可以說，1930年代中葉是日本的美意識、民俗和文藝理論逐漸確立的時代，許多對鄉土和傳統抱持憧憬的日本知識份子，試圖透過學術取徑，探究日本文化的主體性。1937年2月《文藝》雜誌召開了座談會「現代文藝思想的對立——以民族文化的問題為中心」，同年3月，《新潮》雜誌則召開「何為日本精神與文化」之座談會等活動，都說明了中日戰爭爆發的前夜，日本思想文化界對於文化主體性問題的關注。

在此須注意的是，保田抵抗「西歐近代」的方法，乃取資江戶時代國學對外來思想所展開的關於「他者」和「自我」關係的批判概念。保田在其代表作之一的《萬葉集的精神——其成立和大伴家持》中，排斥了將天平文化視為佛教文化之產物的一般看法。他認為，《萬葉集》成立於「漢風」和「國風」、官僚政治和皇親政治、藤原氏和大伴氏的對抗關係中。⁴⁷在太平洋戰爭期間，保田校註《祝詞》，探究和學古典文

大量被引用，特別在中日戰爭爆發的前夕，是有關「日本事物」討論的高峰。參照河田和子，《戰時下の文学と「日本のなもの」——横光利一と保田與重郎》(福岡：花書院，2009)，頁6。

⁴⁷ 在保田的「漢風/國風」對抗構圖中，掌握和歌傳統的大伴氏最終為掌握律令制和漢詩等渡來文明的藤原氏所奪權。不過，此二元論式的對抗構圖，目前已被學界所質疑。如中西進指出，《萬葉集》是在日本與中國、朝鮮半島的交流下、汲取漢詩養分而生的產物。參照中西進，《うたう天皇》(東京：東京書籍，2011)。

獻中的音韻，追求貼近古代日本人的心性和思想。⁴⁸在此我們可以發現，保田的「反近代」策略，是建立於和學的文藝傳統中自古至近代的連續性，作為反制「西歐近代性」人文風景的有效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為使世人重新認識本真的(authentic)日本連綿不絕、擁有獨自脈絡的文藝傳統，中日戰爭期的保田，總有意識地將「回歸古典」的作為和戰爭期間「御用的日本主義」區分開來。1937年9月，當日本進入精神總動員體制後，日本軍部徹底掌控了國民統合的組織與意識形態之形塑。此時期，保田猛烈批判日本自文明開化以來近代化和官僚制的弊端。1939年初，保田於《コギト》上發表〈關於文明開化的論理之終焉〉一文，針對日本自明治期以來追求近代化的腳步提出根本性的質疑。他論道，日本自文明開化期以來對於西洋文化的態度，是一種囫圇吞棗的汲取過程。雖說在文明開化期，活潑的、囫圇吞棗的學習是一種必要，文明開化的論理也停留在囫圇吞棗，即可告終——然而，自文明開化後的數十年，日本都未能建立起屬於日本獨自的文化之論則，所有「近代」的、「知性」的日本文化，不過是英美兩國的「殖民地文藝」。而造成此情況的罪魁禍首之一，即是自明治以來盤根錯節的官僚精神與方法。⁴⁹

保田在批判「文明開化」的立場上，進一步論及中日戰爭帶給日本思想文化界的毀滅性惡果：

昭和十三年四月(1938年4月)，日本的文壇上有教養之人士，尚能以白眼看待事變(盧溝橋事變)。但至九月份，當日本政府派遣了從軍作家之後，文壇與學藝全盤變化了。「文學」明顯地消失了，作家們在戰場上失去了舊有的表現，也喪失了創新力。……御

48 保田與重郎校註，《祝詞》(東京：保田與重郎，1944)。

49 保田與重郎，〈關於文明開化的論理之終焉〉，《コギト》，80(東京，1939)。又收入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全集》，第7卷，頁14-18。

用文藝作為日本主義的替代品，承擔國策的任務，出現在世人眼前。就這樣，日本主義的頹廢開始了。……我們長年以來汲汲營營建立起的教養體系……在今日，由於精神上的打擊，我們不得不放棄這些事物。若我們要在今日的國際上展現自我的地位的話，很明顯地需要新的論則。而這論則必然不能是殖民地式的，也必然不能是被動的開化論則。⁵⁰

對保田這樣在昭和初期度過青春的知識份子而言，昭和的開端，迎來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和文學運動的崩壞；雖然也曾出現訴求回歸傳統價值的「日本精神」口號，但不到數年，這種流行便受到戰爭體制的影響，淪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工具。針對這種文化上「自我」的茫然若失狀態，保田大力批判了當時隨著國策而起舞的「虛假日本主義」：

我們一點也不需要根據舊來的知識份子的「再編輯」而產生的、彷彿新生的日本主義的組織。我們反對的，正是製造出這種組織的思考法背後的意識形態，以及支持著這種意識形態的官僚主義的合理性和「膽怯」。面對這些在歐洲的保護傘下形塑的官僚式論則的系統，今日的日本需要的是，走出保護傘外，抱持著被大雨淋濕也在所不惜的論則。⁵¹

上述保田對「日本精神」或所謂「日本主義」的鑑偽辨真，不僅是為求在精神上「回歸古典」，亦在方法上遵循了前近代國學傳統中對於外來思想的批判手法。

在保田對國學的理解中，國學排斥「漢意」(からごころ)的攘夷精神，並非在於江戶時代「封建式的鎖國」，而在於「反封建式的民族

50 保田與重郎，〈關於文明開化的論理之終焉〉，頁 19-20。引文為筆者自行翻譯。

51 保田與重郎，〈關於文明開化的論理之終焉〉，頁 21。引文為筆者自行翻譯。

感覺之凝結」。⁵²保田最推崇的國學者，一為本居宣長(1730-1801)，二為鈴木重胤(1812-1863)，兩者皆出身於近畿地方的商人地主之家。前者致力於《古事記》的研究，完成江戶國學的經典巨作《古事記傳》；後者則為幕末國學大家平田篤胤(1776-1843)之門生，從事《延喜式祝詞》、《日本書紀》等經典的註釋工作。和本居宣長、鈴木重胤同樣出身近畿有力商人之家的保田，將探究日本古典的國學定位為「町人之學」，認為國學的根柢始於普通的江戶市民生活之日常，國學的立身方法與精神，來自於町人平凡而質樸的生活教養。⁵³

而在保田的日本史認識中，上古是天皇與民眾共同舉行祭祀的時代，神武建國之初，祭政一致，公土為公民所耕，勤勞生產是貫徹於公民之日常的自然法則，官吏的裝飾性大於實用性，尚未出現像近代社會中「官尊民卑」的現象，道德亦自然棲息於稻作文化的日常中，不需訴諸人為製造出的德目。⁵⁴這種對於上古史的見解，流露出保田對「公土公耕」的共產稻作文化之看重，以及他將近畿地方視為大和

⁵² 保田與重郎，〈国文学と大東亜精神〉，收入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全集》，第20卷，頁260。

⁵³ 保田與重郎，〈日本人のくらしと新憲法〉，收入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全集》，別卷3，頁269-270。

⁵⁴ 保田與重郎，〈戴冠詩人の御一人者〉，收入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全集》，第5卷，頁24-25；〈皇大神宮の祭祀〉，收入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全集》，第30卷，頁381；〈天杖記〉，《保田與重郎全集》，第23卷，頁588-589。對於保田這種烏托邦式的古代想像，石川公彌子認為，保田和「轉向後」的文學者林房雄(1903-1975)、龜井勝一郎一般，是將共產的理想投射於天皇之上，將天皇視為一種非私有的文化之體現。參見石川公彌子，《〈弱さ〉と〈抵抗〉の近代国学戦時下の柳田國男、保田與重郎、折口信夫》，頁103。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石川氏特別將保田置於繼承日本近世國學的「近代國學」之脈絡下來探討，認為「近代國學」的特徵在於從「非政治」的立場關照人本身的脆弱與抵抗，進而指出保田在昭和初期推動國學的復興上，具有獨特地位。

之學發源地的鄉土自信。⁵⁵在保田的文化史理解中，近畿地方不僅是孕育日本「紀記神話」的精神原鄉，亦是「大和教養的自我」之所在。

保田獨特的文明論以及他對官僚制之種種批評，自與官方的意識形態扞格不入。揆諸史實，日本政府於 1940 年 12 月 6 日便加強對戰時的言論和報導方面的統籌和監督，設置內閣情報局。1940 年 5 月設立的「報紙雜誌紙張控制委員會」，在 1942 年為止的期間，進行了紙張分配和配給控制，並透過分配制，徹底掌控了對全國的報社、出版社的言論控制。在國家體制日益箝制言論自由的過程中，保田頑強地控訴作為一名文人所遇到的體制箝制：「簡言之，我們這些理解並思考著馬克思主義、日本主義、[盧溝橋]事變和[中國的]抗日[意識]的知識份子們，至此終於陷入了完全的無能狀態。」⁵⁶

在日本對美開戰後的第一場東京空襲前夕，保田在報上發表了題為〈戰爭與歷史觀〉之文章，抨擊僅憑官方教化和宣傳而製作出的意識形態，是一種順應時局而生的政治宣傳，不能為日本人建立真正的歷史觀。保田極力呼籲，日本應堅決排斥用異國的學問權威去說明日本自古以來的歷史思想。⁵⁷

保田在 1943 年《民族的優越感》的序言中主張，為了建立日本人真正的民族意識與民族自信，「古典」是日本人對抗「白人世界主義意識形態」的抵抗概念——時下的日本主義之理論與思想，不過是依

⁵⁵ 保田曾在《萬葉集的精神》(1942)一書中，語帶自負地回想自己在中學時對萬葉集等日本古典的親近情感。橋川文三稱呼此為保田的「鄉土沙文主義」。參見橋川文三，《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說》(東京：講談社，1998 再版)，頁 102。

⁵⁶ 保田與重郎，〈民衆といふ概念〉，《文藝世紀》，2：3(東京，1940)，又收入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全集》，第 13 卷，頁 166。

⁵⁷ 保田與重郎，〈思想戰と歴史觀の確立〉，《國民新聞》，1942 年 4 月 18 日，收入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全集》，第 12 卷，頁 137。

賴「異國之學術權威」而生之物。⁵⁸在此，可以明顯察覺保田的著述理想，是將自古至今和學的文藝傳統，視為日本人表彰文化之「自我」、傳承群體歷史的載體，以此來對抗「西歐近代性」的體制壓迫。

三、保田與重郎的日軍佔領地體驗

1937年8月15日，第一次近衛文麿內閣(1937年6月4日-1939年1月5日)針對盧溝橋事變發出的政府聲明中指出，事件的根本原因在於南京政府「以排日抗日」的意識「作為激昂國論、強化政權的工具」。隔年7月19日的「支那政權內面指導大綱」(五相會議決定)中，欲蓋彌彰的近衛內閣又發佈了關於中日關係的新聲明，聲稱將「尊重漢民族、特別是日中間的共通文化，復活東洋精神文明，徹底禁壓抗日性質言論，促進日中提携」。⁵⁹此時期，包含「東亞新秩序」聲明在內的一系列公式立場，可以說是為了對應中國的「國論激昂」之情況，發起粉飾太平的中日合作之口號。

在上述歷史情境下，進入出版資本主義時代的日本新聞界為了迎頭趕上這波「戰爭熱」，自1937年8月末9月初開始，《中央公論》、《改造》、《日本評論》和《文藝春秋》等雜誌紛紛派遣文學者到華北和上海。1938年2月28日，保田寄給當時的未婚妻柏原典子(後改姓為保田，生卒年不詳)一封信，說明赴中旅遊計畫的緣由：「今晚有人推薦我到中國去旅行。提案者說會將所有的門路事先張羅好，也會幫忙

58 保田與重郎，〈《民族的優越感》自序〉(1941)，收入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全集》，第9卷，頁12。

59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1840-1945)》，下冊(東京：原書房，1966)，頁369-370、390-391。

辦好從軍記者的手續。……然而我尚未下定決心，僅是抱著期待的心情，想前往看看。」⁶⁰

在同年 3 月 5 日、4 月 7 日和 4 月 8 日的信件中，保田一方面和未婚妻敲定婚期，一方面則傳達了前往中國旅行的決心。⁶¹在此時期的保田，不僅和《コギト》的同人舊識往來，亦和《文學界》為首的文藝春秋出版社的文人們頻繁交流。後續誠如保田所言，在預定出發的前夕，4 月 26 日從陸軍省新聞班寄來了記者證。這場戰爭期間的大陸旅行，佐藤春夫以《文藝春秋》的特派員之身分，而保田則以「新日本文化會」的組織刊物《新日本》特派員的名義為之。⁶²

關於此段旅行，雖有保田和佐藤春夫投稿回國內的紀行文留下，但這些文字紀錄主要詳述景色、文物與人物的姿態，對於時間隱而不談，對所遇的真實人物之姓名也以首字母或假名取代。加以戰時施行嚴格的檢閱，對於地名與敏感的人名也以消抹的方式呈現。以下，將透過保田當時送予未婚妻(柏原典子)和友人(中谷孝雄夫婦)的書信、明信片，並依據保田和佐藤所遺留的紀行文，盡可能地還原旅行的真實行程。

保田於 1938 年 5 月 1 日和佐藤春夫、佐藤龍兒(1908-1994)⁶³從東京前往神戶。2 日從神戶抵達下關，乘坐關釜聯絡船的金剛丸前往朝鮮

⁶⁰ 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書簡(收信人：柏原典子)〉，1938 年 2 月 28 日，收入《イロニア》，10(京都，1995)。

⁶¹ 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書簡(收信人：柏原典子)〉，1938 年 3 月 5 日、同年 4 月 7 日和 4 月 8 日，收入《イロニア》，11(京都，1996)。

⁶² 佐藤春夫，〈《新日本》第一卷第五號後記〉(1938 年 5 月 1 日)，收入佐藤春夫，《定本佐藤春夫全集》，第 35 卷(京都：臨川書店，2001)，頁 149。

⁶³ 佐藤春夫的外甥，後改姓為竹田。當時為慶應義塾大學東洋史學科大三生，戰後成為東洋史學家，執教慶應大學。參照江坂輝彌，〈竹田竜児先生を偲ぶ[含略歴・著作目録]〉，《史學》，63：3(東京，1995)，頁 385-391。

半島。3日進入朝鮮境內，經過佛國寺、石窟庵等處，前往慶州。4日參觀慶州遺址和大邱市場，並在大田留宿一晚。5日抵達扶餘，8日則在京城參拜朝鮮神宮，並與京城帝國大學的安倍能成(1883-1966)教授餐聚，當日深夜從京城出發，9日清晨到達平壤，參觀藝妓學校，高句麗古墳等。經一兩日後經新義州，抵達奉天。這段朝鮮古遺跡之巡禮，對於保田而言並不陌生。他於大學期間曾參加帝大組織的朝鮮滿洲之旅，⁶⁴竹內好亦在其中。

1938年，在保田一行即將抵達北平的前夕，5月12日竹內好收到保田的明信片，表示後者會在近日抵達北平。⁶⁵保田等人於5月14日經天津，晚上抵達北平。15日早上，保田於北平散步並訪問竹內。20日夜，在竹內的斡旋下，保田一行同周作人(1885-1967)為首的十多名中國文人會面。23日，佐藤春夫因腸胃病住院，經商量後，佐藤留在同仁會的醫院，保田和龍兒維持原計畫前往包頭。⁶⁶

相較於在朝鮮半島的重點式遊覽，保田在北平停留了約兩週的時間。保田回憶，在北平半個月餘，「能多方瞭解到北平」，全是因為

64 保田與重郎，〈肥下恒夫宛保田与重郎書簡〉，1932(昭和7)年7月29日[復刻]，頁189。

65 竹內好，〈北平日記〉，收入竹內好，《竹內好全集》，第15卷(東京：筑摩書房，1981)，頁214。

66 佐藤春夫於歸國一個月後，在《文藝春秋》上發表了此行相關文章，其中和日本軍方關係者之姓名皆遭抹除。但是根據保田和柏原典子的往來書信可得知，保田在1938年5月25日於張家口與芳賀檀的義兄石本寅三少將(駐蒙軍參謀長)和岡部英一中佐(駐蒙軍作戰主任參謀)會面。5月27日去雲岡的石佛寺，會見白銀重二上校(第26師團參謀長)，在晉北自治政府會見日本人顧問。芳賀檀是前述《日本浪漫派》和《新日本》的同人，芳賀和保田最初相識是因保田大學畢業論文以為題，故拜訪留學德國的芳賀。自此以後兩人維持良好情誼。

竹內好和神谷正男(1910-1972)等人幾乎每日的嚮導。⁶⁷竹內則於日後提及這次「重溫舊交」的機緣，對他而言具有深遠意義。

翻閱竹內和神谷留下的文字紀錄，可察覺二人在日本軍隊佔領下的北平生活遭遇的精神困境。⁶⁸當時，竹內好和神谷正男皆是外務省的遣華留學生，⁶⁹竹內由於盧溝橋事變的爆發，推遲留學日期，於1937年10月抵達北平。他在日記中表達對於沈從文(1902-1988)、梁宗岱(1903-1983)的南下，「痛心至極」。⁷⁰更於《中國文學月報》1937年12月號上，描述對佔領地北平的失望：

來到北平後，我感覺一天比一天遠離戰場。……至少在我所遇範圍內，當地人對重建已被破壞的文化一事，意興闌珊，說著不合適的話語，毫無熱心。原本我暗中期待的，是混亂之中產生的粗暴火力，是雙方思想交會的火星，隨著戰爭，急遽的文化相剋、交流——瞬間發生的從破壞至重建的滔滔奔流，令人心動的光景。然而，現在我去哪目睹這樣的光景呢？我認為，北平的文化已經死去，至少是有秩序地、安穩地沉睡了。⁷¹

⁶⁷ 保田與重郎，〈北平〉，《新日本》，1:12(東京，1938)，1938年12月，收入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全集》，第16卷，頁78。

⁶⁸ 竹內好，〈佐藤春夫先生と北平〉，收入竹內好，《竹內好全集》，第14卷，289頁。

⁶⁹ 神谷正男和竹內好分別於1935、1937年通過外務省試驗，成為「第三種在支補給生」。當時，竹內好的研究題目為〈現代支那的文學〉，神谷的題目為〈近代支那文化的研究〉。有關兩人之留學紀錄，參照外務省作成，〈第三種類補給生名簿——昭和十二年十一月現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596500，在華本邦人留學生關係雜件(H-5-7-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第15畫面。

⁷⁰ 竹內好，《竹內好全集》，第15卷，頁178。

⁷¹ 竹內好，〈北平通信〉，《中國文學月報》，33(東京，1937)，後收入竹內好，《竹內好全集》，第14卷。

這篇文章刊登後，《中國文學月報》在日本的責任者松枝茂夫(1905-1995)受到內務省嚴厲的斥責與警告。⁷²

而比竹內在北平生活了更長時間的神谷正男，⁷³在文字紀錄中奮力呼籲搶救北平文化界。神谷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支那哲學科，自1936年1月開始受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以及日本駐中華民國大使館雇用，調查中國的文化機關。在同年九月，作為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旁聽生入學，參與林志鈞(1879-1960)、胡適(1891-1962)和錢穆(1895-1990)等人的思想史課程。1937年12月3日，竹內將神谷的〈事變後北平文化界的現狀〉一文郵寄至日華學會投稿，⁷⁴該篇文章刊載於《日華學報》1937年12月號。神谷云：

由於這次事變，在中國近世文化史上留下輝煌足跡的北平文化界，幾乎陷入完全的崩壞。我認為這是大不幸。自滿洲事變以後社會調查所的南遷開始，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古物的移管、北平圖書館以及各大學圖書館的善本之南遷等北平文化界的動盪，對於所有的文人而言都是悲痛之事。……自民國十六年南京遷都以來，受到內外壓迫但仍死守北平文化界牙城的，是北平大學、清華大學、師範大學、北平大學此四個國立大學為首，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中法大學等眾多大學，以及所屬於博物院、圖書館等文化體系的這些文化人。由於此次[盧溝橋]事變的發生，以國立四大學為首，直屬於南京政府的文化機關其經費遭到斷絕，教授學生四散各地，北平文化界在

72 竹內好，《竹內好全集》，第15卷，頁187。

73 神谷於戰後任成蹊大學教授，對《產語》投注數十年的研究心血，試圖對經濟思想著作《產語》源自於日本之說提出翻案式見解。參見神谷正男，《產語の研究・校注篇》（東京：書籍文物流通會，1962）。

74 竹內好，《竹內好全集》，第15卷，頁184。

一朝之間陷入崩壞的命運。⁷⁵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在精神上陷入無力狀態的竹內好和神谷正男，開始意識到日本帝國的政治宣傳和中國當地「抗日」意識之間的扞格不入。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本國內的指標性雜誌《文藝春秋》於1938年的新年號上，刊載了時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胡適的演說記錄。其中提到「抗戰以來，中國才實現了真正的統一」，「中國獲得了民族生存上不可獲缺之精神」。然而，該譯文受到檢閱的影響，許多文句遭到塗抹刪去。當時，在神谷向外務省提出的報告書中，他語帶惆悵地談及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僅不理解日本官方所謂「事變的聖戰性意義」，更將盧溝橋事變視為日本大陸侵略政策的必然之階段——這是何以事變開始後，重要的中國知識份子紛紛離佔領地而去、投入抗日運動的原因。⁷⁶

在檢閱的壓力下無法暢所欲言的批判，以及對於中國抗日意識深刻化之感觸，融合而成對日本官方所推行的中日文化親善政策之質疑。神谷在呈交給外務省的報告書中寫道，「在事變之後，在所謂『日中文化提携』的空虛名目之下，雖然有些文化人到了北平」，但「當局若不展現真正的誠意，是無法期待那些南遷文化人的回歸」。竹內好也在〈佐藤春夫先生與北平〉一文中感嘆，事變前的自己居然曾認真相信「日中文化提携」的可能性。⁷⁷

在竹內好和神谷正男的嚮導下，保田的佔領地北平體驗無疑受到了兩人的影響。1938年5月19日，當日軍入侵徐州的消息傳來之際，

⁷⁵ 神谷正男，〈事變後の北平文化界の現状〉，《日華學報》，65(東京，1937)，頁2。參見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639700，〈在華本邦第三種補給生關係雜件/補給實施關係・第九卷〉H-5-7-0-5_1_009(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第82畫面。引文為筆者自行翻譯。

⁷⁶ 神谷正男，〈崩壞過程にある北平文化界〉，《斯文》，20(東京，1938)，頁5。

⁷⁷ 竹內好，〈佐藤春夫先生と北平〉，頁287。

保田在文章中寫道，「我知道懷疑這場戰爭目的的方法。也從這類發想中聽取了意見。」⁷⁸

日軍入侵徐州後，相較於《報知新聞》戰意高昂地宣揚「日本作為東亞的安定勢力，終於向世界雄飛，全國民團結一致，傾注於大陸國策之施行」之熱情，⁷⁹當保田看到北平街頭上中國人慶祝徐州陷落的遊行隊伍時，他以一種冷淡的態度審視遊行隊伍：

那是擁簇五色旗和日章旗的隊伍。那些人們默默且持續地走著，連樂隊都隨附其中的這場遊行有著漫長的行列。這在內地的報紙上也有所報導。然而，從他們的行列中，我感受不到任何有關國家、國民或是民族之類的發想。廣泛而言，我在北京不得不感受到了文化上的絕望。⁸⁰

這種冷淡也反映了他與「留平」知識份子的會面經驗。1938年5月20日，保田在竹內好和尤炳圻(1912-1984)的牽線下，和留在北平的周作人、錢稻孫(1887-1966)等人一同在北平的同和居聚餐。⁸¹對於這場和「留平」中國知識份子的會面，保田闡述了以下感想：

我見到了若干北京的知識份子，當時，與其說是失望，更不如說是體驗到了人的醜惡。他們之中，層次最高者是保持沉默，偶爾說著諷刺話語的騙子。中等者則盡量不提對蔣介石的信任、而暢言對日本的要求——我認為這不是知識文化人的思考

⁷⁸ 保田與重郎，〈北寧鐵路〉，《蒙疆》(東京：生活社，1938)，收入保田與重郎，《蒙疆》(京都：新學社，2000)，頁67。

⁷⁹ 〈東亞安定策を枢軸に革新政策樹立へ〉，《報知新聞》，1938年5月23日。第2張第1頁。

⁸⁰ 保田與重郎，〈北平〉，《いのち——綜合文化雜誌》，6：11(東京，1938)，又收入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全集》，第16卷，頁72。

⁸¹ 佐藤春夫，〈蒙疆のはなし〉，《文藝春秋》，16：10(東京，1938)，頁93。

模式，而是一種商業交易。⁸²

關於這場宴會的感想，竹內好自認還算「賓主盡歡」，而佐藤春夫和保田與重郎則覺得不大愉快。⁸³有關保田對這場宴會的冷漠態度，以及他在北平所感受到的失望，是否源自於對中國知識份子的政治性期望落空，有必要考察保田返日後對於中日關係所發表的論述，徹底探究他對中日戰爭的看法及其中國觀。

根據目前保田所遺留下的書信紀錄和紀行文，可知他在這場戰爭期間的華北旅行，一方面接觸了日本駐蒙中堅將校，另一方面則透過竹內好和神谷正男這些知中派，見識了佔領地北平的真實樣貌。保田在返國後的數月間，開始投入閱讀旅行中無法入手的各式新刊書籍與報章雜誌。這也正好是日本政府強調中日間的「共通文化」，宣示「復活東洋精神文明，徹底禁壓抗日性質言論，促進日支提攜」的時期。1938年10月刊登的〈滿洲之風物〉一文中，保田正面批判由日本的內務省和文部省所主導的「日中文化親善」工作，視之為虛偽：

聚集中國的知識人，讓日本的學校官吏去和他們開會，透過這種文化工作想要達到「日中親善」，無疑是一齣荒唐無稽的企畫。……在中國和蒙古往返的路途上，當我越過滿洲之野時，不得不對在北京進行的文化工作產生很大疑問，更對在東京開會討論的那些事情感到不安。⁸⁴

⁸² 保田與重郎，〈蒙疆〉，《新日本》，1：9（東京，1938），又收入《保田與重郎全集》，第16卷，頁105。引文為筆者自行翻譯。

⁸³ 根據丸山哲史的研究，竹內好也觀察到了中國方面刻意地迴避政治性話題，這和日本方面的計算有所出入。參見丸川哲史，《竹內好——アジアとの出会い》（東京：河出書房，2010），頁61-62。

⁸⁴ 保田與重郎，〈滿洲の風物〉，《いのち》，1938：10（東京，1938），又收入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全集》，第16卷，頁153-154。引文為筆者自行翻譯。

在 1938 年末至 1939 年初，第一次近衛文麿內閣為了和中國國民政府的親日派合作，撤回「不以國民政府為對象」之宣言，並發佈「東亞新秩序」聲明。保田則在此時，吐露對於日本政府所推進的國策式文化合作工作的不安與鬱悶：

在日本宣傳著要重建中國文化政策的背後，我感受愧疚的意識。日本這種鼓吹文化建設的思考模式，總讓人覺得有幾分愧疚之感。想到這些有關文化政策的經綸之前，我時常感到胸中鬱悶之情。⁸⁵

在 1930 年代後半葉的日本社會中，一般群眾、知識份子、軍人和官僚之間，受到了中日「親善」此一國策的刺激，對中國的關心揶揄地高漲。⁸⁶保田對於這種利用時局、一窩蜂的熱潮也表示反感。在訪問北平之際，保田便尖銳批判日軍佔領下的北平是「日本人對中國人觀感的展示會場」。

由此而言，「留平」文人是否積極參與中日親善工作一事，並非保田評價的標準或關照的對象。日本政府在制訂文教政策以及對文化主體性的態度，才是保田在價值判斷上的重要尺度。在返國後的〈蒙疆〉一文中，保田更直接點出他的立場：

在國內失敗的這些教育者——他們並未讓大學和大學生遠離危機、防範於未然——又或者在國內失敗的這些思想家——他們也沒有在軍隊和年輕人的實際行動之前，守護住日本的精神——他

85 保田與重郎，〈文化の論理〉，《怒濤》，3：2（東京，1939），又收入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全集》，第9卷，頁237。引文為筆者自行翻譯。

86 有關這種國策式、揶揄式的「中國熱」，參見子安宣邦，〈「支那事變」とは何であつたか〉，收入《昭和とは何であつたか——反哲學的読書論》（東京：藤原書店，2008），頁118-127，以及戶部良一，〈「支那通」と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否定論の源流〉，《防衛大学校紀要・社会科学分冊》，68（東京，1994），頁39-46。

們這些人，早就失去了[對文教政策]發言的權力。⁸⁷

當我們審視保田對於「留平」知識份子所做出的評價時，必須理解保田是站在批判偽善且虛幻的中日「親善」的立場上，抨擊「留平」知識份子的曖昧態度：

他們——這些北平知識份子，首先暗中地誇讚蔣介石，然後再以牽制日本的方式，向日本的對中政策提出要求。面對這種強辯、理應唾棄的商業對象，日本派出了高級教育官吏來回應。⁸⁸

保田在北平訪問中之所以對「留平」文人冷眼看待，更多是因為他對日本當下官僚主義的文教政策方向和方法失望所導致。

1938年11月25日，擔心保田言論過於激化的佐藤春夫致信中河與一(1897-1994)說，「在本年度，有很多人批評保田的言論過於偏倚某方，產生很多責難，這對將來而言，並非善事，對此我感到很擔憂，其他人很多也有同樣的擔憂。」⁸⁹正如佐藤所憂慮的一般，原來由《日本浪漫派》同人主要運營的「新日本文化會」，在1939年4月因「內部對於從藝文、文化領域跨幅到政治領域的問題上，意見深刻對立」，⁹⁰該會解散。

綜上所述，1938年後半葉至1939年前半葉，是保田和這些文學社群間關係變化的轉折點，也是保田文章開始走出文藝領域，擴及文教政策、時事乃至人物批評的關鍵時期。駐蒙將校言談間的「開闊感」和知中派對佔領地北平的「文化崩壞」之嘆息，讓保田在背離北京古城而去之後，留下「意想不到的幻滅」之感想。

⁸⁷ 保田與重郎，〈蒙疆〉，頁153-154。引文為筆者自行翻譯。

⁸⁸ 保田與重郎，〈蒙疆〉，頁105。引文為筆者自行翻譯。

⁸⁹ 佐藤春夫，〈佐藤春夫書簡(收信人：中河與一)〉，收入佐藤春夫，《定本佐藤春夫全集》，第36冊，1938年11月25日條。

⁹⁰ 保田與重郎，〈文学の立場・覚え書〉，《文学の立場》(東京：古今書院，1940)，又收入保田與重郎，《文学の立場》(京都：新學社，1999)，頁284。

四、保田與重郎的中日戰爭觀

在檢討保田關於中日戰爭的論述前，首先須注意其政治觀。作為目睹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文學運動被鎮壓，「失去了和權力進行正面撞擊之方法」之世代，保田在《文學的立場》(1940年12月)的出版旨趣中，談到關於對抗政府高壓政策的方式：

在今日，人們可以看到不僅在文藝活動上，在一般文化、包含生活和倫理層面，[我們]皆在政治性技術之下受到強力壓迫。由於如此，我要以強力的、帶有政治性的浪漫主義之空想來回應。⁹¹

保田一方面認為，在高壓的國策下，日本在生活和倫理層面逐漸喪失本真的日本精神，他直言「現行的文化統制將賦予當局扭曲『新』事物的權力」，「過去曾經有過的自由主義的時代」或是「自由主義中好的部分」都將首先消失。⁹²這些話語無疑是批評第一次近衛文麿內閣所推行的「東亞新秩序」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但另一方面，「帶有政治性的浪漫主義」使他評論中的措辭，時常疏離於現實政治。他聲稱自己僅僅只是「一介文學者」，故而「放棄」說明「政治性浪漫主義」之內涵。

保田的故鄉櫻井市立圖書館設有保田文庫，收有其藏書。當中除了日本國學和美術史相關書籍外，也有東洋史、歷史學、人類學、考古學相關書籍。若查閱中日戰爭期間保田對於亞洲各地文化的相關論述，可發現他依照民族對文化主體性的關照程度，建立一套獨特的見解。

⁹¹ 保田與重郎，〈文学の立場・覚え書〉，頁277。引文為筆者自行翻譯。

⁹² 保田與重郎，〈文学の立場・覚え書〉，頁279。

受到岡倉天心(1863-1913)《東洋的理想》⁹³的影響，保田認為「亞洲」作為和「西洋」的對峙概念，亞洲的「心情」是一致的。但保田的亞洲論有別於岡倉天心之處在於，即便亞洲的「心情」一致，但更重要的是，這種「一致」在各區域呈現各式各樣、多元的文化主體性。保田云：「我們必須將所有的生命力，貢獻給生命力的流露與展現。在亞洲……印度人以宗教來表現，漢人以制度來表現，而在蒙古，則以大眾的迅速來表現，這些流露全部都屬於同一種亞洲的心情。」⁹⁴

在保田的中國史理解中，他基於「攘夷」與否和文藝成就的高下這兩項標準，來評價各朝代政權。受考古學家濱田耕作(1881-1938)筆下紀行文的影響，保田為包頭的雲岡石窟和明代十三陵賦予了特定的民族性意義：⁹⁵

若不論漢唐之古代，回顧東西交通繁盛的近世，中國最引以為傲的是元世祖時代和康熙時代。康熙帝在尼布楚最初遭遇[俄人]之際便擊敗退了俄人，當清朝無法守護國土之時，將統治權返還給了人民。……那些在明孝陵奉告清朝滅亡消息的漢人，還沒聽過他們為了抵抗外國侵略、做了哪些守護國土之事。⁹⁶

於此，保田將中國的歷史視為「民族自衛」的歷史，歷代政權的正當性則來自「攘夷」的完成與否。對於中國史上所有「攘夷」之舉，

⁹³ 本書英文原題名：*The Ideals of the Ea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rt of Japan*，以東洋的視角概說日本美術的歷史進程。

⁹⁴ 保田與重郎，〈アジアの廢墟〉，《蒙古》，7：1(東京，1940)，又收入保田與重郎，《文學の立場》，頁156。

⁹⁵ 考古學家濱田耕作以「濱田青陵」為筆名，撰寫許多代表性的散文，刊登於《大阪朝日新聞》、《文藝春秋》、《太陽》和《中央公論》等雜誌。濱田曾作〈雲崗から明陵へ〉一文記錄1926年5月至同年12月遊歷華北的見聞。該文收錄於濱田耕作(青陵)，《考古遊記》(刀江書院，1929)。

⁹⁶ 保田與重郎，〈蒙疆〉，頁108-109。引文為筆者自行翻譯。

他都讚揚為「自然的愛國心之發揚」。此處保田之所以將政權的正當性與「攘夷」相互連結，無疑是源於日本國學中排斥「漢意」的攘夷傳統，以及肯定維新时期日本的政治經驗（「尊皇攘夷」口號）。

另一方面，基於追求文化主體性之立場，保田十分重視亞洲諸民族各自的文藝傳統和個性。保田從關照文藝傳統的角度出發，他高度評價中國歷史上面臨諸多外敵、但在文化上有顯著發展的北宋王朝（960-1127）。對於這個自建國至滅亡時常處於戰爭狀態的王朝，保田認為「北宋末期的美學藝術之本質」是「造型」中國藝術、使其系統化的重要因素；《宣和遺事》則呈現了「最美的支那」。⁹⁷

保田高度評價北宋末期文藝的理由，和他肯定「攘夷」此一反抗作為所產生的凝聚力和文化創造力有很大關係。保田所提及的《宣和遺事》，⁹⁸是講述北宋徽宗、欽宗的治世以及王朝崩壞的話本小說，描繪宋王朝在受到異民族入侵過程中君臣誤國和英雄揭竿而起的逸話。讀完《宣和遺事》的保田評價道，「我認為宋代的文明，是最接近文明的文化。」⁹⁹在此我們可以發現，關照文化主體性的保田，他所認識的宋代文明，更多是由所《宣和遺事》反映出，宋代在文化上的精神成就，以及英雄們作為在野的抵抗力量。

在中日戰爭期間，由於「東亞新秩序」的政治宣傳需求，日本言論界上許多文人、學者開始頻繁使用「東亞文化」一詞，探討中日兩國的「共通性」。相較於此波「東亞文化」論，保田在其中日戰爭相關的論述上，反映與其他知識份子極為不同之論點。他在論及東亞諸國間的關係時，他特別強調諸國各自的歷史脈絡之差異：

97 保田與重郎，〈アジアの廢墟〉，頁 152。

98 日本於 1920 年代由國民文庫刊行會出版的〈国訳漢文大成〉系列中，即收錄有《宣和遺事》的漢文版與譯註版。

99 保田與重郎，〈アジアの廢墟〉，頁 154。

提倡從中國人的立場來考慮——這種知性上的純粹論，我認為是毫無意義的。我們是歷經大化改新、源賴朝、德川時代、明治親政而來的日本人，當我們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思考時，是否可以能把歷經明初、明末、清初、清末而來的體悟融入到自己的立場？今日這種類推式、欲將中國人的立場置換為自己的立場之言論，我認為是荒謬至極的。……這種荒謬，事實上就是今日的國際聯盟主義。¹⁰⁰

在保田筆下，個體的文化認同與思考事物的樣式之關鍵，在於其所屬國家的歷史脈絡。若無視一國所經歷過的政治、文化經驗以及其所乘載的傳統，僅空談跨國的區域性統合，乃一種徹底的謬論。此處，保田已超越岡倉天心所受限的時代氛圍，即體認到日本不必然需要「引領」亞洲走向近代化。即便亞洲的心情是一致的，亞洲內部仍有著各自的文化價值與政治經驗。對保田而言，文化價值的獨立才是重中之重。

其次，保田基於關照文化主體性的立場，有別於當時日本大多的知識份子，給予蔣介石政權異常正面的評價。在〈至慶州為止〉一文中，保田一方面責難蔣介石政權的專制性，一方面卻論「蔣介石的支那已非民國初年的支那」，「毋寧說，我深刻瞭解到試圖給予中國人理想的蔣介石的偉大。那是比我們所想像中還要強悍的精神上的敵人。我們不應畏懼支持蔣介石的那些外在勢力。針對那股支持著他們的內在力量，我們不應該去宣撫，而是應該打碎這股力量。」¹⁰¹保田從「攘夷」與「民族自衛」的視角，將蔣介石指導下的中國視為精神上的強敵。

自 1937 年 12 月起，日本除了文部省、內務省之外，民間也派遣了大規模的華北考察團，中日兩國的代表們聚集在文部省召開了「東

¹⁰⁰ 保田與重郎，〈蒙疆〉，頁 108-109。引文為筆者自行翻譯。

¹⁰¹ 保田與重郎，〈慶州まで〉，收入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全集》，第 16 卷，頁 18。

亞文化振興協議會」，協商文化工作。對這樣的文化工作抱有強烈不信任感的保田，強烈否定了與留在佔領區的中國文人合作的必要性，批判日本當局的手法。在 1938 年從中國旅行返國的歸途中，保田閱讀秋山好古(1859-1930)的傳記，留下感想：「對於戰場上的武士之禮儀，並非人道的休戰，亦非勸降，而是選擇殺戮敵人全體或被敵人所殺戮。」¹⁰²在保田眼中，遵循日本古風的戰爭禮儀，應是將敵人看作與自己對等的存在，盡全力地迎擊。

與當時在日本文化界推進「東亞文化」工作的官僚，或者以東亞的進步為名，強調中日合作能加強中國近代化開發的論調相比，保田捨棄一切以同情或人道為名的勸降或妥協，將蔣介石政權視為「強悍的精神上的敵人」。這種將蔣介石政權作為抗日意識的精神符號之作法，可察覺保田更近於將國民政府視為和日本帝國「等身大」的國族來認識。故而，保田在閱讀完宋美齡(1898-2003)刊登在美國《時代雜誌》上的文章後，吐露了以下感想：

讀了宋美齡向美國人發出呼籲的那些文章，議論本身雖平凡，但文章中透露出的那種命運感，是從肉體層面能夠感知的。如果真的要從中國人的立場來思考的話，就把自己視為清末的中國人想看看吧。¹⁰³

筆者認為，保田留意中國的抗日精神，也間接地影響了他對於「留平」文人的觀感。保田在描述與「留平」文人周作人、錢稻孫的晚宴時，明顯以抗日意識的與否，將「留平」文人置於蔣介石的對立面：

對於在北平的中國人，我感到一種殘忍的悲哀——正由於我們將蔣介石視為敵人來對待。這種誇張禮遇北平的知識份子，將其

¹⁰² 保田與重郎，〈感想〉，收入《保田與重郎全集》，第 16 卷，頁 174。

¹⁰³ 保田與重郎，〈蒙疆〉，頁 109。引文為筆者自行翻譯。

作為文化事業中重要商談對象的作法，乃是大大的謬誤。¹⁰⁴

對於重視透過文化傳統傳承歷史意識的保田而言，訴求「中華民族」一元論的蔣介石所率領的抗日意識，與軍閥割據、社會動盪的民國初年之情況大為不同。因此，他認為日本該正視蔣介石政權訴諸民族情感這點，而非根據各式各樣的謀略，試圖以政策性、官僚性的力量去爭取輿論對中日親善工作的支持。上述保田對中日戰爭的獨特理解，特別是看重中國的抗日意識，與當時慣於輕忽中國輿論的大多日本知識份子相比，可謂有極懸殊的差異。

保田自 1938 年後半葉開始頻繁使用「反諷」手法，以偷渡不容於當局檢閱的危險概念。在近衛內閣剛剛發出「復活東洋精神文明」的聲明之際，日本官方對中日關係的理解瀰漫一股強迫的樂觀。此時，保田於連載評論〈蒙疆〉(1938 年 9、11 月)中，反覆提及「即使戰爭無償而終」的概念：

即使這場戰爭無償而終，日本也完成了劃世界史的偉大遠征。

當我站在黃河流經的蒙古之畔，我第一次感受到日本的大陸政策在世界歷史上的位置。……如果從思想的立場而言，即便當下的戰爭以無償告終，那也是一場雄偉的浪漫主義。¹⁰⁵

在保田的亞洲論中，他擅長模糊古代至當代的时间感覺，僅凸顯國族在文化主體性上的特徵。在他的歷史認識中，既然「攘夷」與「民族自衛」是中國史上反覆出現的課題，若將每個事件放回歷史的洪流，當下的中日戰爭，不過是一場中日兩國各自追求文化性「自我」與政治凝聚力的集體行為。因而，這場戰爭得以不問成敗，不計代價。對日本民族而言，即便「戰爭無償而終」，敗戰也可看作是日本文化史

¹⁰⁴ 保田與重郎，〈蒙疆〉，頁 99。引文為筆者自行翻譯。

¹⁰⁵ 保田與重郎，〈蒙疆〉，頁 120。引文為筆者自行翻譯。

上悲壯的一幕而被接受。戰爭「無償而終」並不要緊，重要的是，日本透過戰爭的過程最終深化了什麼。可以說，保田在官方嚴厲取締反戰相關言論的時代，以他擅長的「反諷」，直言不諱地吐露這場戰爭敗北的必然性。在保田的筆下，若日本不顧一切的現實條件，也不問戰爭的結果，那麼中日戰爭這場「劃世界史」的遠征之正當性也將成立。表面上是以高昂、樂觀的口吻宣揚這場戰爭「即使無償告終」也無損其光榮和偉大，但真正的隱藏旋律，卻瀰漫著對戰爭現實的疏離。

在上述激進的思考脈絡下，保田也不苟同第二次近衛文麿內閣對日本帝國主義所做的自我修正。在 1940 年 6 月發表的〈文明與正義觀〉中，保田對於國策式的日本文明論或提倡「東亞文明」之理想的言論，尖銳地表示「看似偉大，但令人感到不過是粉飾行為的一種辯解」。¹⁰⁶在此，保田將對於文化主體性的要求訴諸於中日戰爭，試圖追求一種敵我旗鼓相當的民族對決，故激烈地否決日軍佔領地下當局所欲推行的「中日親善」和「中日合作」。

當然，保田對於中日戰爭的認識與種種措辭，也存在著明顯的缺陷。他對於中日戰爭的論則，無視了政治實態與戰場上的苦難，僅是一種不可捉摸的空想或理想。如同後來保田自身也受到部隊的徵召令一樣，他的「政治性浪漫主義」疏離於政治現實，在戰爭體制面前脆弱而無力。

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事變爆發前夕，保田藉由時評，闡述他對戰爭以及「古典」的複雜心境：

在今日，我們所能做的，比起去從事戰爭論所教導的謀略宣傳或政策文化，更應該是去熱心地祈禱神州不滅的古典之教誨。吾人

¹⁰⁶ 保田與重郎，〈文明と正義觀〉，《大陸新報》，1940 年 6 月 24 日至 26 日，第 3 張第 3 頁，又收入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全集》，第 13 卷，頁 227。

想做的，是回想在古典成為古典之日，當時國家精神的深度與思想的激烈性，並在文章中熱心祈禱這股信念。這便是我們作為文人唯一的使命。……吾人勇於支撐著這個國家的危機，並非我們相信了近代化的時務謀略之文化，而是因為我們信奉著，建立了國之根本基礎的古典之精神將愈加地闡明於世上。吾人將此視為思想戰的第一要義，並意識到對於國家的至誠之道。¹⁰⁷

「熱心祈禱神州不滅的古典的教誨」的措辭，與保田向來的主張相比，極具神秘色彩，甚至可以說，這與皇國史觀的言論相較，幾無二致。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受到戰爭的日常化和檢閱制度的嚴峻化之影響，保田自發地改變文風，加強文章中的皇國崇拜與神道信仰之特徵。

保田筆下的「偉大的敗北」和「無償而終的戰爭」云云，一方面成為遠赴戰場的年輕人們規避官方意識形態的精神出口，另一方面表現與現實的疏離也使得他的作品得以為軍國主義化的戰爭美學所利用。¹⁰⁸這種透露皇國崇拜和肯定「哀」之價值的作為，使得太平洋戰爭結束後，保田變得惡名昭彰，其作品被視為應該被存放於海底數萬呎下的「放射線物質」。¹⁰⁹

綜合上述對於保田的中日戰爭觀之檢討，有關保田和竹內好的思

¹⁰⁷ 保田與重郎，〈感想〉，《東京堂月報》，1941：9（東京，1941），又收入，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全集》，頁450。引文為筆者自行翻譯。

¹⁰⁸ 保田戰爭期間的措辭大多須在國學的脈絡下理解，言語在外型上易被判斷為皇國史觀產物。如保田相當鍾情題字「中大孝」一語，其出自《日本書記》神武紀裡的古代儀式，指稱在申年時人們向天皇和神明、祖先們感謝過往的平安，對自然和父母恭敬。

¹⁰⁹ 大岡信於1958年時回顧保田的文業，談及當時文壇對保田的「追放」：「今日，保田與重郎之名恰似被廢棄在深海中的放射性物質一樣被傳說」。參見大岡信，〈詩人の青春 保田と重郎ノート〉，《ユリイカ》，1958：8-12（東京，1958）。

想話語之異同，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第一是竹內和保田對政治和文學的關係，有著極為不同的見解，這造成兩人在對待「留平」文人的態度上有所落差。相較於保田面對體制的壓迫，決意追求「政治性的浪漫主義之空想」，竹內則在日軍佔領地見聞到政治的無所不在——「即便是路畔的一木一草，都令人感到政治的存在」。¹¹⁰是以，在對於中國的個別人物或事件的感想上，竹內會考量歷史背景與政治環境，對中國的處境多有同情。第二，竹內和保田在亞洲論上有著一定的共通之處，如兩人皆在抵抗「西歐近代」的思想軸上，對於亞洲內部共同體的凝聚力樂見其成。在追求文化主體性方面，竹內明顯認同保田的作法，因此他在 1942 年 11 月時，認同保田的作品才是真正寫出了將「自我」投身於反歷史性的「現代」。¹¹¹可以說，自 1930 年代的《コギト》、《日本浪漫派》到戰時、乃至戰後的作品，竹內終生不曾批判過這位高中同級友人，始終關注著保田的「反近代」論述。

五、結語

從全球史的角度而言，以青年為號召的運動，其原始本質是反舊秩序的政治性運動。保田與重郎求學於「大正教養主義」發展期，成名於日本主義流行的昭和初期，敗戰後則變成燙手山芋，被言論界有意識地遺忘。保田對於近代化和工業文明的批判，如同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筆下歷史天使面前的殘垣斷壁，¹¹²被戰後名為「進步」

110 有關竹內對日常生活與政治的理解，參見竹內好，〈北平通信〉，《中國文學月報》，33(東京，1937)，又收入竹內好，《竹內好全集》第 14 卷。

111 竹內好將保田的《萬葉集の精神》和中野重治的《齋藤茂吉ノ一ト》互相比較，認為前者比後者更寫出了「投身」於其中的「現代」。參見竹內好，〈旅日記抄〉，收入《竹內好全集》，第 14 卷，頁 425-426。

112 取自本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1940)

的風暴遺棄於歷史的洪流中。

根據本文的考察可知，保田批判近代化的話語，是以日本國學的倫理觀和自然觀作為抵抗軸，反抗「西歐近代」的人文風景。保田的「反近代」策略，是以和學從古至今的文藝傳統，制衡與反動「西歐近代」。在 1938 年 5 月的北平旅行中，保田透過竹內好、神谷正男的嚮導，獲得了接觸日軍佔領統治下北平的機會，也從中耳聞中國抗日運動的消息。由於親眼目睹華北文化界的「崩壞」，以及對日方教育視察團體的反感，返國後的保田，全面否定了當時日本內務省和文部省在華北欲推行的「中日親善」政策，並批判處於戰爭狀態的敵對雙方從事親善工作的虛偽性。保田返國後的著述活動，評論的範圍從文化延伸到東亞與民族相關課題。他一面批判「中日親善」論的荒謬，一面根據社會在文化主體性的關照與否，建構了一套獨自的論則。戰爭期間，保田強調文藝傳統作為承載共同體的歷史性共感之重要性，並強調中日兩國歷史脈絡的差異。

就日本「反西洋」或「反近代」的思想史脈絡而言，1930 年是左翼運動的實踐與熱情陷入退潮的時期，也是身為社會精英的知識份子容易接受「西方的沒落」和「中國非國論」的時代。以純粹文人自居的保田，與政治評論原來應是完全無緣的。但當官方試圖指導輿論界、提出語焉不詳的「東亞文明」或「中日親善」時，保田對於文化主體性的問題意識使他無法認同官方對於東亞的論述和政策。太平洋戰爭初期，保田一方面執著於利用古典研究方法詮釋古代日本人的思想和精神，呼籲日本建立真正的歷史觀。一方面則堅決否定三木清(1897-

的第九節中，以描繪歷史天使回望廢墟、「逆向梳理歷史」的意象，批判唯物史觀信仰者自詡人類必然進步的機械式「進步」論。有關本雅明的歷史哲學，參照柿木伸之，《ヴァルター・ベンヤミン——闇を歩く批評》（東京：岩波書店，2019）。

1945)等人移用「異國」之學所進行的區域統合論述。¹¹³對保田而言，無論東亞諸國各自經歷了怎樣的「近代」，若是輕視各自所承載的歷史脈絡，不可能有實現區域統合的契機。保田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堅持發掘日本古典精神，抨擊虛偽的「大東亞文藝」和「國家神道」的內涵，直至他於病中被徵召入伍為止，筆耕不輟。

綜上所述，若將保田的思想論述置於和學史的脈絡，可知其並非一種特殊的、斷裂的思想。保田以「古典」為概念裝置，對「近代」提出質疑，涉足時評並非其本意。但在總力戰體制籠罩社會的時期，模稜兩可的反諷論法成為保田繼續發聲的「保護色」。官方的意識型態可以隨意摘取保田「樂於逝在大君之旁」之文句，¹¹⁴任意發揮，但保田也透過日本國學鑑偽辨真的批判概念與「反諷」的措辭，反覆地重誦「即便戰爭無償而終」，散佈對戰爭的消極態度。誠如橋川文三所言，被保田所吸引的戰中派世代，往往缺乏「權力衝動」，且「脫離了合理的、近代市民的行動模式」。¹¹⁵保田「強力的、帶有政治性的浪漫主義之空想」將自身與閱讀者抽離當下的時空與真實的戰場，試圖透過沉耽於傳統價值的追求，來規避個人面對體制時的無力與脆弱。在某些偶然的情況下，作者和讀者之間會形成某種無聲的默契，同為謀反體制的共謀者；但在另一些情境中，無處抒發政治性浪漫主義情懷的青年們，可能會被「對永恆的思慕」¹¹⁶之追求所牽引，為犧牲的「物哀」美學而赴命。在

113 有關保田和三木清之間，圍繞「東亞協同體」論所產生的文明論爭，有待筆者日後再撰文分析。

114 保田與重郎，〈古典の解釈と時代思想〉，收入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全集》，第20卷，頁111。

115 橋川文三，《增補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說》，頁14。

116 此處是引用和辻哲郎將本居宣長的「物哀論」的特徵之一歸納為，日本人自平安時代以來「對永恆的思慕」之心性。和辻哲郎，《日本精神史研究》（日本：岩波書店，1926），頁231。

此，若將這些書寫與閱讀行為斷罪為法西斯主義運動的一環，不免忽略保田的思想論述，有著繼承前近代文藝傳統的一面。

透過本文對保田「反近代」思想的整體考察，我們可以獲得以下兩項比較思想的線索。首先是關於保田和竹內的「反近代」思想的聯繫。在昭和初期，當日本面臨國際地位產生變化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退潮，在美學、倫理學和社會科學等諸領域產生了探究「他者」和「自我」間論述的學術風潮，保田和竹內都試圖透過抵抗「西歐近代性」的人文景致，來深化日本文化的主體性。竹內的抵抗軸是魯迅文學，保田的抵抗軸則是和學傳統的連續性。由於兩人的「反近代」思想萌芽於國家權力壓迫下言論自由緊縮的 1930 年代，故他們的思想話語中總是流露著對權威(authority)的警惕。

其次，是關於保田的思想論述與納粹德國政治審美化(Aestheticization of politics)¹¹⁷的比較。透過掌握保田「反近代」思想的立場和措辭，我們可以發現，保田自我定位為 1930 年代政治經濟劇變下「失去了和權力進行正面撞擊之方法」的世代，因而論述中極少提及政治上的「自我」，而專念以日本古典研究方法中批判「他者／自我」的手法，彰顯日本文化上的「自我」。這種規避政治、專念於個體內心世界的作法，反映了「大正教養主義」世代在戰爭期間的非政治(nonpolitical / ノンポリ)¹¹⁸屬性。筆者認為，這種駐足於政治領域的邊陲(文化評論)批評政

¹¹⁷ 源於本雅明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1935)中，將德國法西斯主義作為「政治審美化」的一模型而進行的批評概念。其最基本的內涵應包含，以美學方式實現政治目的，使政治目的擁有美學上的感召力。參照 F.R. Ankersmit, *Aesthetic Politics: Political Philosophy Beyond Fact and Valu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¹¹⁸ 根據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赫爾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和羅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對「非政治」(nonpolitical)一語所做的界

治，最終又反為極權政治所利用的發展，令日本產生有別於納粹德國政治審美化脈絡的昭和戰爭美學；這也是丸山真男為何在意「思想上的日本浪漫派」的非政治屬性之故。¹¹⁹

(本文於 2021 年 2 月 8 日收稿；2021 年 8 月 31 日通過刊登)

*本文承蒙科技部計畫「日本個人觀的近代轉型：從「人格主義」到「街頭哲學」」(MOST 109-2410-H-031-052-MY2)之獎助。部分內容曾發表於 2020 年 12 月 16 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世界史研究室舉辦的專題演講「日本的近代批判與戰爭——以保田與重郎為中心」，感謝藍弘岳教授的邀請。筆者尤其感謝兩名匿名審查人提出的指正與修改建議，使本文論述更為完善。

定，作為政治哲學概念的「非政治」有別於「無政治」(apolitical)和「反政治」(anti-political)。在三者的概念比較上，「無政治」是對政治事務毫無興趣、不願投身於其中，「反政治」是支持反體制的政黨或訴諸直接行動，而「非政治」則是駐足政治無法決定的邊界和邊緣上，提醒政治的有限性，並專注自我的完備。在「非政治」思想的表述上，代表人物之一為本雅明。埃斯波西托在 1999 年版《非政治的範疇》(*Categorie dell'impolitico*)的前言中提及，「非政治並不意味著弱化或放棄對政治的關切，相反地，它的焦點甚至更為激進和劇烈。」參照 Roberto Esposito, *Categories of the impolitical*, translated by Connal Parsley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5, [義大利原文版初刊於 1988 年])。

¹¹⁹ 根據丸山的弟子橋川文三所言，丸山對於戰前的「日本浪漫派」，曾提及保田繼承了「某種非政治性(一種のノンポリ)」的傳統。丸山的此發言與橋川本人閱讀 Carl Schmitt 的 *Politische Romantik*(1919, 1925)所受的啟發，成為日後橋川剖析自身的「日本浪漫派」體驗之契機。參見橋川文三，〈丸山真男氏に聞く《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説》以前のこと〉，收入橋川文三，《橋川文三著作集》，第 7 卷(東京：筑摩書房，1986)。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一)文集

- 竹內好，《竹內好全集》，第 14-15 卷，東京：筑摩書房，1981。
- 佐藤春夫，《定本佐藤春夫全集》，第 35-36 卷，京都：臨川書店，2001。
- 保田與重郎，《日本的橋》，東京：芝書店，1936。
- 保田與重郎，《日本浪漫派の時代》，東京：至文堂，1969。
- 保田與重郎，《後鳥羽院》(東京：思潮社，1939)
- 保田與重郎，《英雄と詩人》(東京：人文書院，1936)
- 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全集》，全 45 冊，東京：講談社，1985-1989。
- 富士谷御杖著，三宅清編，《新編富士谷御杖全集》，第 4 卷，京都：思文閣，1986。

(二)新聞

- 《報知新聞》(東京)。
- 《每日新聞》(東京)。
- 《東京朝日新聞》(東京)。
- 《都新聞》(東京)。

二、近人論著

- 丸川哲史，《竹內好——アジアとの出会い》，東京：河出書房，2010。
- 大阪高等学校七十週年記念祭事業委員會編，《旧制大阪高等学校史》，大阪：大阪高等学校同窓会，1991。
- 大貫惠美子，《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
- 子安宣邦，《「近代の超克」とは何か》，東京：青土社，2008 年。

- 子安宣邦，《昭和とは何であったか——反哲学的読書論》，東京：藤原書店，2008。
- 小川徹，〈戦中派の保田与重郎体験〉，《現代の眼》，16：12(東京，1975)，頁 184-191。
- 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曜社，2002。
- 中西進，《うたう天皇》，東京：東京書籍，2011。
- 井上司朗，〈ますらをにして詩人、そして預言者——保田與重郎の思い出〉，收入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全集》，第 30 卷，東京：講談社，1988，頁 1-3。
- 戸部良一，〈「支那通」と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否定論の源流〉，《防衛大学校紀要・社会科学分冊》，68(東京，1994)，頁 39-46。
- 王升遠，《文化殖民與都市空間——侵華戰爭時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體驗」》，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
-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1840-1945)》，下冊，東京：原書房，1966。
- 平野敬和，〈ロマン派体験の思想史〉，《甲南女子大学研究紀要・文学・文化編》，42(神戸，2006)，頁 167-175。
- 田中久文，《日本美を哲学する——あはれ・幽玄・さび・いき》，東京：青土社，2013。
- 石川公彌子，《〈弱さ〉と〈抵抗〉の近代国学 戦時下の柳田國男、保田與重郎、折口信夫》，東京：講談社，2009。
- 伊豆利彦，〈日本浪漫派と戦争・序章——保田与重郎を中心に〉，《国文学——解釈と鑑賞》，44：1(東京，1979)，頁 69-77。
- 伊藤隆編，《松本学日記》，東京：山川出版社，1995。
- 有馬學，〈田所輝明と満洲事变期の社会大衆党——1930年代における「運動」と「統合」(一)〉，《史淵》，125(九州，1988)，頁 83-108。
- 有馬學，〈日中戦争と社会大衆党——1930年代における「運動」と「統合」(二)〉，《史淵》，129(九州，1992)，頁 65-85。
- 江坂輝彌，〈竹田竜児先生を偲ぶ[含 略歴・著作目録]〉，《史學》，63：3-4(東京，1995)，385-391 頁。
- 竹山護夫，《近代日本の文化とファシズム》，東京：名著刊行会，2009。
- 竹内好，〈近代の超克〉，收入伊藤整編，《近代日本思想史講座》，第 7 卷，東京：筑摩書房，1959。亦收入竹内好，《日本とアジア》，東京：筑摩書房，1993。

- 佐野正人，〈日中戦争期の言説としての保田與重郎〈蒙疆〉〉，收入吳京煥、劉建輝編著，《日本浪漫派とアジア——保田與重郎を中心に》，京都：晃洋書房，2019，頁 124-125。
- 杉浦明平，《暗い夜の記念に》，愛知：杉浦明平，1946。
- 岡山麻子，《竹内好の文学精神》，東京：論創社，2002。
- 河田和子，《戦時下の文学と「日本的なもの」——横光利一と保田與重郎》，福岡：花書院，2009。
- 知的協力会議編，《近代の超克》，東京：創元社，1943。
- 柿木伸之，《ヴァルター・ベンヤミン——闇を歩く批評》，東京：岩波書店，2019。
- 浅野晃述、檜山三郎，《随聞・日本浪漫派》，長野：鳥影社，1987。
- 相良亨，《誠実と日本人》，増補版，東京：ペリかん社，1998。
- 唐木順三，《新版 現代史への試み》，東京：筑摩書房，1963。
- 夏目漱石，《現代日本の開化》，收入夏目金之助，《社会と自分》，東京：実業之日
本社，1913。亦收入福田恆存編，《反近代的思想》，東京：筑摩書房，1965。
- 神谷正男，《事变後の北平文化界の現状》，《日華学報》，65(東京，1937)，頁 1-10。
- 神谷正男，《産語の研究・校注篇》，東京：書籍文物流通會，1962。
- 高山樗牛，〈文明批評家としての文学者——本邦文壇の側面評〉，《太陽》，7：
1(東京，1901)，又收入高山林次郎，《樗牛全集》，第 2 卷，東京：博文館，
1906，頁 833-843。
- 高田瑞穂，〈生田長江作品解説〉，收入伊藤整等編，《日本現代文學全集》，第 46
卷，東京：講談社，1967。
- 清水正之，《国学の他者像——誠実と虚偽》，東京：ペリかん社，2005。
- 清家基良，《戦前昭和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諸問題》，東京：錦正社，1995。
- 渡辺かよ子，《近現代日本の教養論——一九三〇年代を中心に》，滋賀：行路社，
1997。
- 渡邊和靖，《保田與重郎研究——一九三〇年代思想史の構想》，東京：ペリかん社，
2004。
- 筒井清忠，《日本型「教養」運命》，東京：岩波書店，1995。
- 鈴木貞美，〈保田與重郎の《近代の終焉》〉，收入吳京煥、劉建輝編，《日本浪漫派
とアジア——保田與重郎を中心に》，京都：晃洋書房，2019，頁 3-20。
- 熊木哲、杉浦靜、須田喜代次、松木博，〈肥下恒夫宛保田與重郎書簡〉[復刻]，《大

- 妻女子大学紀要・文系》，26(東京，1994)，頁 183-200。
- 福井英雄，〈「逆コース」と戦後体制の形成〉，收入日本政治学会編，《戦後国家の形成と経済発展——占領以後》，東京：岩波書店，1991，頁 211-230。
- 橋川文三，〈丸山真男氏に聞く《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説》以前のこと〉，收於《橋川文三著作集》，第7卷，東京：筑摩書房，1986。
- 橋川文三，《増補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説》，東京：未來社，1965。
- 濱田耕作(青陵)，《考古遊記》，東京：刀江書院，1929。
- 鶴見俊輔・加々美光行編，《無根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を超えて——竹内好を再考する》，東京：日本評論社，2007。
- Ankersmit, F.R. *Aesthetic Politics: Political Philosophy beyond Fact and Valu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Doak, Kevin M. *A 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Modern Japan: Placing the People*. Boston & Leiden: Brill, 2007.
- Doak, Kevin M. *Dreams of Difference: The Japan Romantic School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 Esposito, Roberto. *Categories of the Impolitical*. Translated by Connal Parsley.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5.
- Hashimoto, Akiko. *The Long Defeat: Cultural Trauma, Memory, and Identity in Jap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Ohnuki-Tierney, Emiko. *Kamikaze, Cherry Blossoms, and Nationalisms: The Militarization of Aesthetics in Japanese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Yasuda Yojūrō's "Anti-Modern" Thinking and Views of China

Bau-man Tz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Soochow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offers a partial intellectual portrait of Yasuda Yojūrō, a famous Japanese critic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t examines Yasuda's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and his writings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explores the place of his "anti-modern" thinking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Japan. The article first sketches the current of thought known as the critique of the modern (*kindai*) in Japan, in which Yasuda Yojūrō occupied a significant role. It then demonstrates how Yasuda made use of Japanese national studies (*kokugaku*) and German Romantic literature to articulate his refutation of the "modern Western European." Following this, the article observes what and how Yasuda experienced, together with Takeuchi Yoshimi and Kamiya Masao, during their stay in Japanese-occupied Beiping in May 1938, as well as their criticism of the "Sino-Japanese cultural goodwill" policy. Finally, it analyzes Yasuda's unique view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verall,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anti-modern" thinking of the early Showa era was characterized by its emphasis on cultural subjectivity. On the one hand, Yasuda inherited the literary and art tradition from Japanese national studies in order to stand against the "modern Western European" cultural landscape; on the other, to fight against the curtailing of the freedom of

speech, he always kept a distance from political authority, thereupon developing certain war aesthetic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

Keywords: Yasuda Yojūrō, anti-modern, national studies (*kokugaku*), “overcoming modernity” (*kindai no chokoku*), Takeuchi Yoshimi